

军事情报学

主编 张晓军

撰写 张晓军 李耐国

申 华 刘心铭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情报学/张晓军主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137-521-1

I. 军… II. 张… III. 军事-情报学 IV. 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703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7.125

印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书号:ISBN 7-80137-521-1/E·348

定价:12.00 元



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①

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战争只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战争的性质,在阶级社会只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

二、战争与军事情报的关系

战争与军事情报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中,任何一支军队要想获得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准确而充分的情报。

(一)军事情报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自从出现了阶级,也就出现了战争这一暴力工具,与此同时,军事情报也随之产生了。我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情报活动是公元前 21 世纪时夏朝的少康派女艾和季杼分别打入过、戈两国内部进行侦察。甲骨文中已有情报人员的专门名称——“搜”和“往”^②。这说明当时的情报活动已比较频繁。《孙子兵法》对春秋以前军事情报活动的经验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六韬》中也有关于情报活动的记载,周武王向姜尚请教君主统帅军队辅佐人员构成的问题,姜尚就明确提出其中应该有“地利(专门了解部队行军所到之处的地形地貌的人员)三人”、“耳目(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外交官,主要职责是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情报)七人”、“游士(即今之间谍)八人”。^③这些都是我国上古时期关于情报活动的记载。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波斯等也都很早就建立了军事情报工作,

①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华星白:《孙子稗疏》,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③ 《六韬·龙韬·王翼》。



透露给美国^①，于是美国就在 1917 年的 3 月 12 日向德国宣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给美国的这份情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再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由于美国成功地破译了日本海军将进攻中途岛的情报，从而预先做好准备，结果在中途岛一战中重创日本海军，改变了太平洋上美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所获得的这份情报也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有时候，军事情报也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在我国战国时期，秦军进攻韩国的阙与，赵王派赵奢带军去救，赵奢知道有秦国间谍在自己军中，因此在离赵国都城邯郸 30 里的地方就停滞不前，并严令军中不得谈论进军之事。秦国间谍以为赵奢胆怯，归报于秦军主帅。秦国间谍去后，赵奢令部队昼夜兼程，两天一夜之后赶到了阙与，结果秦军因准备不足被打得大败而回^②。这个战例一方面说明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情报的重要性，秦军就是因为没有掌握有关赵军的准确情报，所以才会失败。

(四)作为信息战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报战已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

① 当一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德国潜艇不断地袭击英国商船，企图采用饥饿的办法来击败英国，而能援助英国的只有美国，但美国人不想卷入千里之外的欧洲战争。于是德国人想趁机铤而走险，动用大西洋北部的所有潜艇大干一场。为了阻止美国人参战，德国外长齐默尔曼制定了一个计划：让美国忙于在墨西哥战场作战，使它没有时间也没有装备来帮助英国。1917 年 1 月，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发去密电，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英国人同时还获取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发给他在墨西哥的同事的同样内容的密电，这两份密电的内容正是齐默尔曼的计划。于是英国人就把这份情报交给了美国人。

②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



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①

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战争只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战争的性质,在阶级社会只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

二、战争与军事情报的关系

战争与军事情报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现代战争中,任何一支军队要想获得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准确而充分的情报。

(一)军事情报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也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自从出现了阶级,也就出现了战争这一暴力工具,与此同时,军事情报也随之产生了。我国文献记载的最早的情报活动是公元前 21 世纪时夏朝的少康派女艾和季杼分别打入过、戈两国内部进行侦察。甲骨文中已有情报人员的专门名称——“搜”和“往”^②。这说明当时的情报活动已比较频繁。《孙子兵法》对春秋以前军事情报活动的经验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六韬》中也有关于情报活动的记载,周武王向姜尚请教君主统帅军队辅佐人员构成的问题,姜尚就明确提出其中应该有“地利(专门了解部队行军所到之处的地形地貌的人员)三人”、“耳目(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外交官,主要职责是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情报)七人”、“游士(即今之间谍)八人”。^③这些都是我国上古时期关于情报活动的记载。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波斯等也都很早就建立了军事情报工作,

①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华星白:《孙子稗疏》,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③ 《六韬·龙韬·王翼》。



透露给美国^①，于是美国就在 1917 年的 3 月 12 日向德国宣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给美国的这份情报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再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由于美国成功地破译了日本海军将进攻中途岛的情报，从而预先做好准备，结果在中途岛一战中重创日本海军，改变了太平洋上美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所获得的这份情报也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有时候，军事情报也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在我国战国时期，秦军进攻韩国的阙与，赵王派赵奢带军去救，赵奢知道有秦国间谍在自己军中，因此在离赵国都城邯郸 30 里的地方就停滞不前，并严令军中不得谈论进军之事。秦国间谍以为赵奢胆怯，归报于秦军主帅。秦国间谍去后，赵奢令部队昼夜兼程，两天一夜之后赶到了阙与，结果秦军因准备不足被打得大败而回^②。这个战例一方面说明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情报的重要性，秦军就是因为没有掌握有关赵军的准确情报，所以才会失败。

(四)作为信息战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报战已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

① 当一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德国潜艇不断地袭击英国商船，企图采用饥饿的办法来击败英国，而能援助英国的只有美国，但美国人不想卷入千里之外的欧洲战争。于是德国人想趁机铤而走险，动用大西洋北部的所有潜艇大干一场。为了阻止美国人参战，德国外长齐默尔曼制定了一个计划：让美国忙于在墨西哥战场作战，使它没有时间也没有装备来帮助英国。1917 年 1 月，齐默尔曼给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发去密电，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英国人同时还获取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发给他在墨西哥的同事的同样内容的密电，这两份密电的内容正是齐默尔曼的计划。于是英国人就把这份情报交给了美国人。

②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



在人类社会,情报活动涉及军事、政治、外交、安全、经济、科技以及其他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人们对情报活动的印象虽然往往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但在自觉或不自觉搜集、传递和使用情报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情报活动的普遍性,对情报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明了:“情”者,即情况;“报”者,即通报、传递。当然,从学术角度看,这种解释过于通俗和简单,但它确也概括了情报的两大本质属性。

关于情报的科学概念,目前国内情报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各种角度下的定义有很多种。在这些纷杂的定义中,以“信息”论和“知识”论两种居多。

“信息”论的观点在国外较为流行,现译作“情报”一词的英文 Information,俄文 Информация,均来自拉丁文 Informatio,其基本含义是消息传递的意思,日文中的“情报论”指的也是“信息论”。信息是指生物以及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机器,通过感觉器官和相应的设备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一切内容。显然,从这一角度给情报下定义概念过宽过于笼统。

“知识”论的观点在国内较为普遍,认为“情报是作为存贮、传递和转换对象的知识”,“是激活了的知识”等等。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概括和如实反映。对情报来说,这一概念仍然过宽过泛,而且有一定的片面性。

当然,以上这些观点也有其合理性,它们都部分地看到了情报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综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给情报下这样一个定义:情报是通过某种手段和方式获取并经过选择处理过的,具有一定时效和特定价值的,作为传递的信息、知识、现象、事实和数据等。

(二)情报的属性

情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其本身固有的属性。前



面我们在介绍情报的概念时,实际已经指出情报的基本属性主要是知识性和传递性。

1. 知识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

人们在各种活动中,搜集、传递、利用情报,目的在于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反映客观事物的情报,无论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还是“传递中的知识”,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是感性知识。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复杂的情报素材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是理性知识。所以说,任何情报,都是知识。知识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

2. 传递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

一切事物都是可知的,运动的。情报的传递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情报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获得;另一方面,情报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进行传递。情报本身就是一个传递运动的过程。情报从搜集到使用,都是一个传递过程。只有经过传递,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情报的传递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

由此可见,有情不报,报而无情,都不能称之为情报。除以上两种属性之外,情报还具有选择性、价值性、社会性及情报与载体的不可分离性等特征。

二、军事情报

军事情报是情报的一个种类。上述情报的定义当然适合对军事情报的解释。但为了突出军事情报的自身特点,使之对它的概念能有一个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我国、我军颁布的一些军事法规和出版的辞书等,对军事情报的概念作了大致相同或相似的解释。

《军语》(1982年版)的定义是:已获得的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指挥员下决心的重要依



外,还有不少政治、外交、经济和科技等情报,对研究、论证军事情况和军事问题有直接和间接的参考作用,但在情报划类上有的并不属于军事情报。

第三节 军事情报的性质和作用

一、军事情报的基本特性

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等各类情报,均具有情报的共性,都是为了满足某一领域的需要,采用各种手段去获取并传递有关知识。由于军事情报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要满足军事斗争的需要,因此情报内容、获取手段、处理过程等方面更需具有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

(一)目的性

也称针对性,指军事情报是为军事斗争、国防建设和部队作战这一特定目的服务的,是针对国家和军队的长期需求、作战的直接需要来搜集、整理和处理有关知识的。偏离了这一目的,军事情报不仅会成为无的放矢,不能满足军事上的紧迫需要,而且还可能给各级指挥员带来干扰。目的性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决定军事情报的内容,获取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决定军事情报比之其他情报具有更高标准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的要求,它还决定各级各类情报人员的情报意识以及工作的责任感和积极主动性。

(二)准确性

指情报所反映的是真实的客观实际情况,包括有关数据准确、分析判断准确、推理准确、报告通报准确。各类情报都要求

^① 本节内容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情报学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



准确,而军事情报对准确性的要求尤其高。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军事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不准确的情报,其后果往往是有害的。如前面第一节中所举的战国时代的秦赵“阏与之战”,秦军就是因为得到的情报不准确,所以大败而回。

(三)时效性

也称及时性,指情报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及时和不失时机地提供使用。尤其是反映动向情况的情报,更加强调时效性,以不贻误战机。情报都很注重时效性,军事情报对于时效性的要求尤为严格。它是决定军事情报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武器的破坏力大大增加和运行速度大大加快的现代战争中,时间更是特别珍贵,对情报时效性的要求就更高了。一份动向情况的情报,有时因一分一秒之差而贻误战机,使这份情报变得没有多少价值。情况的预报是时效性的最好体现,不能预报的情况也要求不失时机地及时迅速报导。反映基本情况的情报在时效性要求上,虽不及动向情况那么强,但亦应不断更新,使之符合客观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保障情报的时效性,侦察手段的现代化、传递手段的通畅和快速、对情报搜集的及时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的有效及时,都要相应地妥善安排和解决。

(四)连续性

也称不间断性,指情报连续不断地反映和提供客观情况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更需要不间断地反映和提供瞬息万变的最新情况。连续性是军事情报的性质所决定的。军事情报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不间断地,不分平时和战时,不分昼夜,密切注视情况的变化,反映这种情况的军事情报必然也是不间断的。特别是在战时,情况瞬息万变,情报更是不能间断。另外,军事情报都是要立足于反映最新的情况。每当新的情况发生时,军事情报都要随时反映出来。各种手段获取的情报资料多数都是零星片断的,而且对任何情况的了解都会



分为来源、时间、地点、情节、原因和结果。

来源,即获得情报的手段和途径及提供情报的单位或人,有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之分。时间,即事情发生、发展、结束的时间和获得情报的时间。时间因素关系重大的情报,要求时间要尽可能详细,如飞机入侵和导弹发射等,不仅要求交代年、月、日,必要时还要交代时、分、秒。地点,即事情发生和经过的位置,如国家、地区、地域或单位等。涉及重要目标的情报,地点要尽可能详尽,必要时其位置要有具体地理坐标标明。情节,指情报反映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具体过程,重要之处要有详尽的细节。原因,指情况发生的原委,包括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等。结果,指情况发生后的发展变化情况,以及情况搜集和处理人员对事情判断、预测的结论性看法。

情报要素越齐全,内容越具体,情报质量就越高,其价值也就越大。

三、军事情报的作用

军事情报的价值是军事情报存在的前提,它主要是通过情报用户对情报的实际利用所产生的作用来体现的。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军事情报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一)军事情报是制定战略决策的基础

任何国家的决策者作某种决策,特别是作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战略决策之前,都是以情报作为依据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提出了我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与毛泽东同志对中日两国国情、国力的深刻了解分不开。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提出裁军百万这一战略举措,其前提就是他对当时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国际形势的深刻了解。

情报对于决策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意识到了,并对此有明确



讯。这些情报传到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手中。但是他们没能运用这些情报做出准确的判断,仍然沉浸在6年前的“六日战争”巨大胜利的喜庆回忆之中,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不可能再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以色列人相信,如果发生战争,他们有能力突破敌人的防线,直逼埃及首都开罗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阿拉伯国家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只不过是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而已。与以色列的判断和预料相反,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在犹太人欢度其最神圣的节日——赎罪日的这一天早晨,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进攻。这次“赎罪日战争”,虽然战争后期局势发生了逆转,最后以色列转败为胜,但是它付出的代价却是昂贵而惨重的,2700多名士兵阵亡,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也因为这次战争失利应负重大责任而被撤职。^①

(三)控制的手段^②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系统的整个联系都有赖于情报。整个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又分为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中又都设有指挥机关和管理对象,这些层次之间都彼此联系着。管理层需要接收报告,下达命令、传递和整理情报、拟写各种战斗文书,进行各种复杂的计算。作为执行层需要接收命令、向上报告情况等。要完成这一系列工作,必须借助于情报把二者融会贯通和组织起来,这样管理者才能处理好上级与下级、本部与友邻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彼此间的行动。管理控制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及时地获得情报和有效地使用情报。情报是把整个系统有机结合起来的粘合剂。整个管

① 曹宏:《摩西的门徒——以色列情报机构揭秘》第十章,国防大学出版社版1998年版。

② 以下内容参见王鸿明、高建明:《军事情报整编研究》,军事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对情报的处理。情报信息的反馈,还可以引导管理者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校正,对整个军事行动进行有效的控制。

(四) 威慑的因素

情报威慑是利用情报和情报力量,采取多种方法,直接或间接地给敌对一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贸然动用武力或扩大事端,以实现己方的战略目的。情报威慑属于“软威慑”范畴,是一种在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中广泛使用的,风险较小、代价较低、效果明显的斗争手段。情报和情报力量具有保障和威慑两大作用。一般来讲,在战时主要起保障作用,在平时则主要起成慑作用。当今世界正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战略家们都非常重视对威慑的研究,以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情报的威慑作用,古人已有所认识。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孙子有“上兵伐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用兵之道。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利用情报成慑的战例。著名的汉将“增灶退敌”和宋将“吊羊撤军”等等,都是运用情报威慑的成功战例。随着战争史的不断发 展,后来还出现了心理战和伪装部队等专门从事情报威慑的组织。随着情报技术的不断发展,情报威慑的天地更加广阔,人们对情报成慑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情报威慑已成为维系、调节各国之间战略平衡的重要法码。威慑方法也在反侦察、反情报的基础上得到很大的发展。如:采取多种方式显示情报力量;利用宣传舆论工具进行情报斗争;以情报实力为后盾进行高技术打击等。由此可见,情报已和人力、物力一样,成为一种资源和力量。

(五) 情报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

情报战是未来信息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信息战其他作战样式的前提条件。从本质上说,信息战是围绕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争夺而展开的信息对抗;情报战是围绕



信息获取而展开的信息对抗,因此是信息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信息战中,围绕信息的争夺与对抗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与使用权的争夺中,信息的获取是前提。以夺取信息获取权为目的而展开的情报战,既是信息战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是展开其他信息对抗的基础。没有情报就不能有效地实施心理战、精确战、电子战等作战。^①

第四节 军事情报的分类

现实军事斗争中的情报是复杂多样的。军事情报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常见的主要是按目的和范围、来源、获取手段等进行分类。

一、按目的和范围可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

(一)战略情报^②

战略情报是有关国家或社会集团安全和战争全局的情报。是决策者进行战略决策、制定战略计划、筹划和指导战争的重要依据之一。

战略情报具有全局性、广泛性、稳定性和不间断性等特点。战略情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国家、集团和地区的军事思想、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军事实力,武装力量的体制、编制、装备、部署及其变化;战场准备;战争动向;军队的历史,军政素质及作战特点;高级军政领导人的素质、经历和特点;国力资源和战争

^① 周碧松等:《21 世纪信息战》,未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5 ~ 69 页。

^② 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情报学分册》“战略情报”条,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哀公元年》载：“（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女艾为我国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位间谍。

商代的军事情报活动更趋频繁。商朝被分封于外的外服官，替商王镇守边疆，亦具情报搜集职能。商王国周边的侯伯、田、牧、卫在守卫四土的同时，还为王室派出搜集情报的人员，及时向商王传递军事情报和周围方国的动向。通报边境紧急军情、侦察周围方国动态并向王室报告，是当时情报人员的主要任务。^① 商纣王曾秘遣崇伯虎监视周文王的行止。商朝的伊尹（又名伊摯）亦是著名间谍。《孙子·用间》即曾指出：“昔殷之兴也，伊摯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掌握占卜、祭祀大权，主持政治、军事的商代卜巫之官，其职能包括情报分析。商代甲骨文献中也充斥着对敌情的求索。这是因为占卜并非纯粹的骗术，事关重大，必须根据已有的蛛丝马迹去探究预测，以便使预测、分析尽可能与真相、结果相吻合。

西周时期，军事情报活动加速了脱离原始状态的进程。周朝开始将情报工作纳入国家行政，设“大行人”、“小行人”之职，负责对诸侯的情报、监察工作。《周礼·秋官·士师》载，士师中就有“邦”、“邦谍”等情报人员。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征伐商纣之先，也曾派吕尚（又名吕牙）负责侦察商朝情况，吕尚使用“相敌”、“动敌”之法获取军情，辅佐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

可见，积极施展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已成为夏、商、周三代战争中的常见现象，军事情报活动在我国早期的战争实践中得以充分发育。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情报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战争频仍，军事情报活动得到长

^① 参见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414～415页。



侦察,使得战场情报活动开始成为战争中部队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几次关键战役中他都娴熟运用情报活动,分化瓦解敌军,取得卓著战功。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六院四辖·进奏院》载:“唐藩镇皆邸舍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各藩镇纷纷在京城设进奏院,名义上是藩镇驻京城的联络机构,向中央政府进奏各地情况,实际乃借以搜集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大事的情报机构,进奏院还将有关重要情报内容编辑成我国最早的情报刊物《开元杂报》。这也是中国古代情报以公开文件形式出现的开端。

宋代在与辽、夏、金的对峙中,双方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密切,各政权之间在边境上开展了频繁激烈、花样繁多的情报战。宋朝时,由于特殊的内外环境,对使者的情报职能更为重视。明文规定,凡出使的宋使,必须留心对象国的地理、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情报,回国后还要录之为书,名之曰“行程录”、“奉使录”等,上报至枢密院,作为重要情报存档。北宋时,出使辽国的欧阳修、曾巩等,均有此类著作。沈括出使辽国时还将其山川险易、风俗人情等绘成极具战略价值的《使契丹图》。

与此同时,宋朝制定法令限制书籍、文书流向契丹、高丽。北宋文学家苏轼即有较强的忧患意识与保密观念。因担心“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苏轼任杭州知州时,特地下令禁止宋商、宋僧前往高丽私作联系,并强烈要求朝廷禁止高丽购买宋朝书籍,认为“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元太祖成吉思汗以 39 年征战欧亚,建立横跨欧亚的王国。他虽无专门军事著述,但注重施展各种手段掌握敌情,运用机动灵活的闪击战战略战术,因而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当时元军的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堪称世界一流,战时元军情报部门派出的轻骑兵常常前出部署,深入敌境数百里之遥实施侦察、警戒。



明代朱元璋在建立政权过程中擅长针对敌方首脑展开情报活动。其后诸藩王与中央政权间的情报活动激烈无比,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等各类特务组织在对内情报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清代情报活动开始逐渐转向,将目光投向了对中国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以防范和抵御外敌。自清道光年间起,西方列强开始频繁派遣间谍来华进行侦察活动,俄、英、法、德、日等国间谍以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等身份为掩护大肆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两广总督林则徐为禁绝鸦片,抵抗外敌侵略,饬属“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初至广州上任“就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为研究外国情况,拓宽国人眼界,他还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并命手下翻译了 1836 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上报道光皇帝。

中国古代的军事情报活动系统,主要由情报搜集和情报传递两个环节构成。情报搜集手段主要包括,一是以调动敌人的方式进行战斗侦察。二是将帅调查研究。将帅巡视战场地形地貌、敌军之驻地与阵形、询问社情民情、审问敌军俘虏,即所谓“料险计敌”、“谋及负薪”、“谋及庶士”,“凡得生口,无问逆顺,皆不辄杀,以招来者,渐以诱问敌情”。(《武经总要·行军约束》)三是用间。如公元前 200 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山,后施反间计厚遇冒顿阏氏方解围脱身。

在情报实践中,古代情报活动中涌现了许多情报人物,出现了著名的情报战例,并逐渐设立了专职的情报机构。情报机构设置的规模、种类、作用,都是随时代的需求而演化的。中国古代情报机构的一般特征是,其对外军事职能与对内监视、镇压职能常常混淆,即寓间于政,多将监察机构与军事情报机构合而为一。此外,用间等情报活动大多由军政长官临时实施和秘密单独派遣,依托帝王将相的个人授权而存在并发展。唐赵蕤《长短



经》^①指出,参谋部设有“练形三人”,“主军行止、形势、利害、远近、险易、水涸、山阻”;“耳目七人”。唐肃宗时,太监李辅国曾组织了一个拥有数十人的间谍机构,称之为“察事厅子”,专门从事秘密侦察活动。宋代,则由枢密院组织情报工作。宋太宗时设皇城司伺察军政。辽朝的枢密院分南北二院,其中北院“掌兵机、武铨、群牧”,元代仍袭此风,并于战时设行枢密院。清代咸丰年间,湘军头领曾国藩饬属成立“情报采编所”,编辑出针对太平天国的《贼情汇纂》十二卷,整理汇集了太平天国主要首领、制度、宗教、文化、兵员成份、军队数量、根据地和物资储备等情报。1901年,张之洞等上书,“更请仿英法之总营务,日本之总参谋部,于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国近代情报机构军咨处第二厅,负责对世界各国的军事情报活动。该厅下设五科,分别为日本与朝鲜科、俄国科、英美及英语国家科、德国及德语国家科、法国及法语国家科。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落伍,中国近代的军事情报工作已难抵强敌的人侵了,成为那个可悲时代的脚注之一。

在情报技术上,中国古代的情报侦察手段是多元化的,但发展缓慢,致使情报传递、保密技术逐渐落后。古代情报传递的方法和工具在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它不仅反映了古代情报活动之活跃,也反映出强烈的情报意识和保密观念。据史书记载,首先,古代情报人员常将密文写于丝绸或纸张上,然后搓成圆球用蜡裹住藏在信使身上,或由其将蜡丸吞入腹中传递。这种传递方法一直沿用至清朝。其次,用兵符(又称“阴符”)来传递重大和战略性的军事情报。第三,将旗帜、鼓声和烽火合用传递紧急情报和战场情报。孙子《军争》云,“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

^① 《长短经》卷九《兵权·练士》。



第二节 外国军事情报史

一、外国军事情报活动概述

外国军事情报活动是指,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有关各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的军事情报斗争。它从古到今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情报活动的范围、方针任务、途径手段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古代外国军事情报活动

间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圣经》记载,远古时代,以色列和埃及的偏僻小道上,时常留下一些密探的足迹。历史与其说是由数不胜数的战争与条约、谈判与协议所创造,还不如说是一些人从事卓有成效的情报活动的结果。揭开远古时代神奇传说的帷幕,我们便可察觉情报活动的闪光点。鸽子衔来橄榄枝向困在方舟里的诺亚提供了洪水退落平安已到来的情报。摩西所派 12 名勇士通过精明的情报活动使犹太人迁出埃及。

在国外,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军事情报活动发生在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记述的公元前十二世纪古希腊人以木马藏兵的计策攻占特洛伊城,是外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军事情报活动。公元前四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希腊军队就运用在腰带上书写移位后的文字密码来传递情报。公元四世纪希腊出现了隐蔽情报内容的初级密码。

公元前三世纪布匿战争时期,交战的罗马与迦太基两国都善于进行间谍战。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甚至多次带上假发和假须,亲自化装潜入罗马军营刺探军情。恺撒在征服高卢期间,也曾多次指派间谍携假情报潜入敌营,欺骗敌人。

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情报间谍活动也不断强化,军事情报



间,秘密的间谍战更是波诡云谲。如德国情报机关在敌国边境地区布建许多间谍网,向法国、俄国派遣了数以万计的间谍,获取大量情报。英国的反间谍工作做得出色,它在战前已掌握了德国间谍的全部名单,战争爆发后将其一网打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参战国为适应战争需要,都大力加强了本国的情报与反间谍工作,情报战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情报机构,增加情报人员。各主要交战国都扩大和新建了情报机构,派遣情报人员在交战国和中立国积极开展活动。如协约国在中立国荷兰设有 500 多个情报组织,在比利时有 2000 多名间谍在活动。总而言之,德、英、法、俄的情报工作都比较得力。美国情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特别在远东和中欧已具有独立的情报活动能力。1917 年 5 月,美国陆军情报处在纽约开设了代号为“黑屋”的密码破译中心。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日,就筹建无线电侦察窃听、密码破译的情报部门,海军部大楼“40 号房间”成为英国专门破译密码的重要情报机关。至 1919 年,“40 号房间”共截获和破译了 1.5 万份德国密码电报,所提供情报对协约国战胜德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二是情报工作的技术手段有新的发展,情报工作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密码通信已相当普遍,许多国家都成立了侦察破译对方密码的机关。围绕着密码的加密和破译展开了极为激烈而复杂的较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曾在这错综复杂的密码情报战中留下了叹为观止的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也是全球首度密码情报大战,交战各方均大量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联络,并都广泛地使用无线电密码传递各种作战文书和情报,都在不遗余力地破译敌方的密码,而又千方百计地保住己方密码不被破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密码术的被广泛应用,以及敌对双方破译密码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可以视为现代情报史的开篇。这期间,法国和英国在这场密码情报战中独领风



骚。1914年8月爆发的著名的马伦河之战,就是法国和德国之间展开的一场密码情报战。法军依靠及时截获德军密码电文而迅速地改变了作战计划,并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一举击溃了德军。在此期间,英国和德国发明了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名特务电台。在监听技术方面也有较大的进展,德国建立了无线电截收站,还发明了电话窃听装置。空中侦察照相技术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反间谍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为对付敌人的间谍情报活动,各国都先后建立或加强了反间谍机关和保安系统。在加强保密工作的同时,对所有信件和电报,尤其是同外国来往的信件和电报,实行了战时严密的检查制度。如当时英国的邮检人员发展到五千多人,查出了31种语言的密写或密码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促使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把镇压人民、监视共产党、破坏苏联和世界人民革命运动作为其工作重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外国军事情报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各国改组和扩大情报机构,加强情报间谍活动。德国建立了20个情报机构,遍布军内、政府部门、纳粹党内乃至世界各地,无孔不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我国领土已久,1931年日军即在沈阳建立了谍报机关,指挥在东北的情报活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布建了庞大的情报组织。美、英、法等国也及时调整并加强情报机构,扩充实力,情报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在德国主要城市都有间谍网,并打人心脏部位,取得不少重要情报。苏联的情报工作也取得极大成效。二是扩大了情报工作的职权范围。情报机关在现代战争中的职责由单纯搜集军事情报,扩大到搜集敌人的国力情报,从行动破坏扩大到对敌国进行心理战,造成敌方内部不稳,对打击敌人、配合战争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三是间谍技术手段有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无线电台已广泛使用,在交通困难、邮检严格的情况下,秘密无线电台使联络畅通、情报传递及时。当时苏联在欧洲德占区有数百部秘密电台。英国发明电波侦测器,又促使电台向机型微小化和发报方向快速化发展,二战末期,小型快速电台已经问世。另外,间谍的联络和传递情报的方法增多,密码破译工作也有较大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直至冷战期间,密码战一直是军事情报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各国都针对敌国和国际关系中的敏感地区进行密码通信的窃听、截收和破译,建立大规模的电子侦察系统。比如,从30年代开始,美国海军先后在西海岸的西雅图以及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中途岛、菲律宾群岛设立了无线电侦听和测向站,侦收、破译日本海军和外交电报。马歇尔在总结二战胜利原因时不无得意地称:“无论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行动,还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都与我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截收到数人的通讯有报大的关系。”

二、二战后以来外国军事情报斗争的发展变化

人类的情报史上,情报手段历经了以谍报为主要手段的人力情报、以电子窃听为主要手段的技侦情报、以电子或照报侦察为主的卫星情报三大阶段。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情报工作主要指依靠人力直接深入到敌方刺报情报,情报工作几乎等同于谍报工作。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情报领域的广泛运用,军事情报工作的内涵深化外延扩大,军事情报工作的手段出现重大革命性变化,经验型的情报研究方法也加速脱落,情报活动的范畴由单纯的军事拓展到人类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情报工作更为普及的职责是通过分析研究公开文献和各种侦察仪器获取的数据资料来掌握敌人情报。1960年8月,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开始对全球进行太空侦察。此后,研发并运用间谍卫星、电子间谍飞机获取图像情报成为世界情报活动发展的一大热点,越来越普遍。



第三章 军事情报思想史

第一节 中国军事情报思想史

一、古代军事情报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整体发展轨迹呈两头辉煌,中间暗淡景象。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与古代军事思想的其他内容一样,精深博大,灿烂辉煌,但其发展缓慢又曲折。总的趋势看,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较快,但此后的秦汉到清末两千多年,发展缓慢,重大理论突破不多。之所以如此,除了军事技术革新停滞,很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禁锢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了军事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重权谋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本特征。谋略思维在中国古代军事活动包括情报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曾把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大类。精妙的谋略思维导演出成功的情报活动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俯拾皆是。

自从出现完整意义上的战争以来,人类也就有了作为作战指挥关键环节的情报活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情报活动早在夏朝就产生了。情报思想的产生根源于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而军事情报在军事上成功运用,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对情报问题进行思考,加深对其内容、作用等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军事情报思想。中国自夏代以后,产生了正式军队,兵器装备得到了



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局面,《孙子》、《孙臆兵法》、《吴子》、《尉繚子》、《司马法》、《六韬》等大批兵家的兵法著作纷纷问世,形成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情报理论,正是由兵家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孙子》首度系统阐明了军事情报的科学体系以后,军事情报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内核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孙臆兵法》中的军事情报思想,他认为知“道”是获胜的必要条件,而军事情报即是“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八阵》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则战,弗见则诤,此王者之将也。”该书还将“不用间”、“不知道”视为导致失败的因素之一,从反面论证了军事情报的重要性。

《鬼谷子》是纵横家惟一的经典传世之作,后人奉之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其认识论堪与《孙子》的军事认识论相媲美。二书均以研究制胜之道为核心,《孙子》较之则更为宏观。《鬼谷子》以外交人员对外交往中的情报搜集与保密为立足点,着重于游说主体如何认识进而制服被游说的客体。略嫌不足的是,书中过于强调言语上的攻防技术细节,理论深度和宏观视野显得不够。书中认为,识为谋先。“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揣篇》)^①

《隋书·经籍志》载:“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志者也。”《鬼谷子·揣篇》也自称其内容为“说之法”、“说人主”之法,实际上,该书是一部研究情报认识方法论的著作。《鬼谷子》认为,“言有象,事有比”,可“象其事”、“比其辞”,进而“得人实”。

^① 本文所引《鬼谷子》原文参见正统道藏本,见《新编鬼谷子全书》,房立中主编,学苑出版社,1995年版。



即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书中提出的认识方法有:一、“捭之”,就是通过语言进攻,让对方开口说话直接获取情报。《鬼谷子》认为,语言是思想的门户,“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捭阖》)。因而可以运用语言的攻防做到刺探情报与严守机密。“捭之者,料其情也”(《捭阖》)。具体的法则是,“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捭阖》)通过语言上进攻观察对方心理倾向,进而取得其真实意图,这是该书主张的最主要认识途径。二、“反听”,就是因言索辞。不能从言语中直接获取真实情况时,与对方周旋,根据“象其事”、“比其辞”的法则,从其不断的反应中获取情报。“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具体的做法是,“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反而求之,其应必出,以反求复,观其所托”(《反应》)。三、“揣”、“摩”,即情报综合分析判断。《鬼谷子》认为,人的思想变化必然在表情、态度、语言等外部形态上有所反映,只要注意观察,就能够“见其类、得其情、制其术”(《内键》),从对手的外在表现来了解其掩饰的情况,进而找到制服对方的谋略。又如,“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内键》)。揣摩法可以由敌之谋事掌握其志意,知之不深不透,就不会将事情办好。“摩者,揣之术也”,“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摩篇》)。通过顺着对方的思路的办法分析判断其真实情况,然后实施谋略,就能大功告成。四、“量权”,即系统分析。在解释何为量权时,《鬼谷子》指出,“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知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揣篇》)《飞箝》也指出,“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



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总之,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战斗力诸要素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五、“测深探情”,即运用心理活动规律,根据对手外在明显的情绪变化,来推测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换言之,“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揣篇》)。

虽然历代军事家在使用间谍和情报运用上时有创造之举,但秦朝至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发展缓慢,基本未能突破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范畴,只是在已有的框架内进一步丰富,亦未能在深度上超越《孙子》,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其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引伸和创造。后人对以《孙子》为代表的兵书研究运用,往往在时代经验基础上,使之当代化、实用化。

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继《孙子》后辟有论述情报的专章《行人第二十三》,就如何用间、怎样通过外交活动收集情报提出许多精辟论述。该书的特色是对于从心理学角度收集情报作了深入思考,较为系统地总结了通过交谈套取情报的技巧。如:“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再如:“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异,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在情报心理学领域继承并发展了《鬼谷子》的认识论。该书还主张保密应做到“若鹰隼之人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唐代史学家杜佑用三十五年时间编成《通典》一书。其中《兵典》以大量篇幅、详实战例论述了情报侦察在战争中的作用。

北宋许洞“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①,吸取孙子、李

① 《虎铃经·自序》。



二、《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神宗下诏令国子监整理校定先秦以来广为流传、最有代表性的《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繚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并雕版刊行,号称《武经七书》,^①作为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该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丛书,勾划出了宋代以前军事学术发展的大致轨迹,从而奠定了古代军事学的基础。

作为我国古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与军事学说精华,《武经七书》^②中有着大量军事情报论述:《孙子》十三篇中有十二篇、《吴子》六篇中有五篇论及军事情报内容,^③《孙子》可以说是我国军事情报学的开山之作,几乎篇篇涉及军事情报。它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军事情报著作。《六韬》中的军事情报内容也较为丰富、全面。其他几部兵书也有特色不一的军事情报论述。《武经七书》中的军事情报思想堪称丰富而成熟,现代军事情报理论的基本范畴如情报认识、情报收集、情报分析、情报应用等内容,^④在《武经七书》中均有所论及,它们构成了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基本反映了军事情报在古代战争中的地位,也体现出古代兵家对军事情报工作的认识水平。它表明我国古代的军事情报思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一)《武经七书》中的军事情报认识论

在我国古代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启示下,《武经七书》留下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卷二百六十。

② 本文以下所引原文均据宋刻影印本《武经七书》校订,原书收入刘鲁民主编:《中国兵书集成》卷一,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不再出注。

③ 除《孙子·势》、《吴子·励士》外,二书各篇均有情报论述。

④ 参见王鸿明等:《军事情报整编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0年版。



出的,并且成为古代军事情报认识论的基本命题。

《武经七书》除《孙子》与《尉繚子》外,并未直接提出情报获取问题,但它们都主张侦察敌情。如《司马法》的“刃上察”、“间远观迹”^①、《吴子》的“动敌”^②、《六韬》的“凡深入敌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势”^③等观点,实际都隐含与认同了“情报取于人”这一前提。

1. 情报价值。对于情报价值,《武经七书》有着大量深刻而准确的论述,比起今人亦毫不逊色。

首先,情报是作战取胜的前提。以妇孺皆知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核心论点,《孙子》大篇幅论述了情报的重要性,强调要“庙算”、“校之”、“经之”。认为获取情报是正确决策、取得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谋攻》)。即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情报战的胜利。“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少算不胜”(《谋攻》)。战前经过大量情报搜集和研判的一方,获胜的机率大。将帅不掌握敌方情报就无法获取胜利。

在作战与情报的关系上,《孙子》充分认识到了情报对作战的保障作用。书中指出,情报先行,作战次之;情报的掌握与运用是“源”,制定谋略、依策行动是“流”,充分的情报积累是正确决策的先决条件;没有情报,决策就会变得无的放矢乃至适得其反。《孙子》反复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又说:“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地形》)。这些论述找到了战争中敌我关系上制胜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争取主动的关键首先是

① 见《定爵》。

② 见《论将》。

③ 见《绝道》。



侯之谋”这种战略情报,就制定不出妥当的军事战略,也就无以与各国开展外交。《军争》指出:“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孙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国力量此消彼长,更迭不断,各国均依利而动、因利而合。因而,及时掌握各国的动向及意图,巧妙与之周旋对于国家的生死存亡就显得十分必要。《孙子》强调指出:“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蔽而起。”(《作战》)“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

可见,以《孙子》为代表的《武经七书》军事情报认识论,站在了战略全局的高度,从军事战略与军事情报的主从关系入手,确立了军事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武经七书》中的军事情报收集思想

正因为充分认识到情报“必取于人”、情报价值巨大,《武经七书》十分重视情报收集,提出了一套客观而又周详的收集内容和收集办法。

1. 收集内容。《武经七书》认为,战争及其准备活动中的一切内容均为收集对象。《六韬·垒虚》从将帅素质要求角度提出了情报收集工作的内容:“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战争中可能而临的一切客观因素,包括对作战有影响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需要收集的情报内容。《孙子》认为,在战争定谋用兵之前必须有一个“知”的过程,要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一切情况,大至于己彼的“五事”、“七计”等战略情报,小至于“众寡”、“强弱”、“饥饱”、“劳逸”、“战地”、“战日”甚至“舍人姓名”等微观情报。内容越完整周详,取胜才越有把握。例如攻城,就连城中各色人等的姓名都要知晓。大致说来,《孙子》所要求搜集的情报内容分三方而。一是知兵,即研究掌握军事活动的规律,以及战争的内在要素间的客观联系和各要素对战事的重要作用;二曰知天,即获取有关战争的时间、空间情报;三为知人,即了解将帅的谋略和心理活动规律及彼我双方军中的士气等。又



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3)战场环境。一是地形情报。《李卫公问对》叹曰：“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①《六韬》称，“凡深入敌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势。”并要“谨视地形而处”。^②《吴子》指出，“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深浅，乃可为奇而胜之。”^③二是气象情报。《吴子》认为，“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④作战形态的变迁，导致情报收集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⑤在这一演变中，人在战争中的积极主动作用日益突显，战斗中对敌方实力布置、战场环境等情报的侦察变得更为迫切。

2.侦察途径。尽管与当今高科技条件下技术侦察手段有天壤之别，可当时的侦察手段却也已相当完备，自成体系。

(1)相敌。就是近距离侦察，即用肉眼直观地观察敌方动静。《孙子·行军》率先提出了“相敌”的情报收集办法，主张用眼观耳听的方式取得敌方情报。这是一种原始平常的搜集办法。^⑥通过观察自然现象的变化、敌方的动静来取得情报。由于目视视野有限，因此相敌除了眼观耳听外，还包含着依据因果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因素。《六韬》提出借助工具来观察。其中《军略》说，“视城中，则有云梯、飞楼。”《火战》指出，受到敌人火攻时，“则以云梯、飞楼远望左右，谨察前后”。《司马法》也提出，

① 见《李卫公问对·卷中》。

② 见《绝道》。

③ 见《应变》。

④ 见《治兵》。

⑤ 见《六韬·战车》。

⑥ 相敌：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复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效地提供核心、关键及内幕的情报。孙子按间谍们的工作方法将其分为五类：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司马法》指出，“凡战”，“观迹”不足时，则“间远”。《吴子》主张“善行间谍”。“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①在两军相持不下之际，要迅速派出间谍，收集掌握其真实意图。

（三）《武经七书》中的军事情报分析思想

《武经七书》的情报分析思想是其情报思想的精粹，其中的情报分析论述从看得见、听得清、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注重从现象的联系与发展中去揭示本质，遵循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则，散发出科学和理性的光辉。

1. 情报分析的理论基础。首先，情报分析须符合战争规律。《武经七书》认为战争中存在客观规律“道”、“存亡之道”，^②“安国之道”、“治兵、料人、固国之道”^③。其次，在战争对抗中，双方都保密、伪装、欺骗和隐蔽企图，情报分析就要不断剥离假象，获取真相，进而使得作战指导符合战争实际。情报分析符合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使情报分析变得必要与可能。《六韬·军势》明确地提出了情报分析的理论依据：“圣人征于天动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当天地盈缩因以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即圣明者根据天地间变化，反复探究其运行规律，进而推断出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要根据自然规律来把握战况的变化，掌握不住战争规律和战争发展趋势，人再多也打不胜。

《吴子》认为，战争活动中有着“安国之道”、“治兵、料人、固国之道”及“进兵之道”、“行军之道”，那么就应“绥之以道”，行动

① 见《论将》。

② 见《始计》。

③ 见《图国》。



出的敌情虚弱可击的情形。^①《尉繚子》揭示了经识别的情报，“矢射未交，长刃未接，前噪者谓之虚，后噪者谓之实，不噪者谓之秘”；“众夜击者，惊也。众避事者，离也。待人之救，期战而蹙，皆心失而伤气也。”^②《六韬》也指出了二十六种征候下的真相识别。^③（2）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吴子》也认为可“以见占隐，以往察来”^④、“观敌之外而知其内，察其进而知其止”^⑤。《六韬·兵征》指出，“胜负之征，精神先见”。进而提出了根据士气盛衰、阵势治乱和军纪严弛来判断敌军的强弱，预测战争的成败。在战前就可分析得知“强征”、“弱征”、“大胜之征”、“大败之征”。《三略·上略》也指出了几种敌情迹象与真实情形间的关系。^⑥《孙子》在首篇《计》一开头就主张，“（兵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要求将帅通过审度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即依据情报分析来对战争情势作出预测。《孙子》提出了详实的情报分析方法。对于纷乱繁复假象掺杂的表征，要进行联想和比较，首先应做好情报的识别筛选工作。《行军》对三十二种情报征候作了推断。一类讲可以利用刚与敌军接触观察到的敌方动态，来探知敌军所处地形；一类是说在与敌军对峙时，可依据自然界的反常现象，来判明敌军行动；一类是根据敌使来往和敌方官兵

① 原文为，“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见《料敌》。

② 见《兵令上》、《兵教下》。

③ 见《奇兵》。

④ 见《图国》。

⑤ 见《料敌》。

⑥ 原文为：“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虑也；民有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



书中认为，“（凡战，）称众，因地，因敌令阵”^①。战前要充分搜集掌握己方军队实力、地形与敌情等情报，依据敌情排兵布阵。又说，“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②

《三略·上略》也提出了相敌而动的情报应用思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

《六韬》提出“见虚则进，见实则止”的情报应用思想^③。

《孙子》认识到，战争变化无常，战争指导、情报应用也要随机应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④

从以上分析可见，《武经七书》深刻认识到了情报应用要根据敌情变化而变化这一问题，论述相当精彩。这实际也成为我国古代情报应用思想的内核之一。

2. 隐真示假。《武经七书》主张通过诡诈手段来夺取整个作战过程中的情报主动权，保证己方自始至终掌握战场情报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因此该书在强调知彼知己的同时，又注重严防彼方知己，把情报欺诈作为获胜的重要手段。《尉繚子》也提出了实施情报欺诈的办法：“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⑤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敌人就无所适从。

作为中国古代的大谋略家，孙子战争谋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实施欺诈。他在强调知彼知己的同时，又注重严防彼方知己，把情报欺诈作为获胜的重要手段。孙子在《军争》指出：“兵

① 见《定爵》。

② 见《用众》，下同。

③ 十四变为：“敌人新集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可击，不暇可击，艰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可击”。见《武锋》。

④ 见《虚实》。

⑤ 见《战权》。



以诈立。”在《计》中强调：“兵者，诡道也。”阐明战争就是一门斗智的艺术。接着他提出了十二种诡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些诡计重在隐瞒蒙蔽，一方面而是用作防御性的隐真示假，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近与远都给敌方以假象，使其决策建立在假情报基础上而致误，同时以假情报挑动敌人，不间断掌握敌情；另一方面是用作进攻的，施放假情报，如诱敌、避敌、挠敌、骄敌、劳敌、离敌，主动挑动敌人，使其失去章法，处于有隙可击的不利地位，然后捕捉取胜之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关于主动性、进攻性的欺诈，《孙子》还提出运用间谍来施行。对于“敌人之来间我者”，主张以厚利“反间”而用之；另一方面，“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用间谍的生命来换取敌人的上当受骗。《六韬》也主张，以隐真情示假形的办法为敌制造虚假前提，从而使其判断失误，它说，“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①自己要以严谨的态度明察秋毫，对敌要隐真示假高深莫测。《六韬·林战》提出要“高置旌旗，谨敕三军，无使敌人知吾之情。”通过蒙蔽、保密教育等办法对敌进行情报封锁。

《李卫公问对》主张利用迷信误导敌方，指出，“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②强调欺诈是误导敌人的必要手段，不可废弃。“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说，“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给数人假象，从而麻痹或威慑敌方。

3. 心理作战。依据军人战场心理活动规律应用情报是古代

^① 见《上贤》。

^② 见《李卫公问对·卷下》。



报传递中保密。《六韬》指出,将帅在战场与后方君主通信时,以阴符来传递情报,并详细说明了八种阴符不同的形制及其约定包含的内容。“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①

阴符传递的情报内容重大却又简约,容量毕竟有限。当情报内容较多、阴符已难以胜任时,使用“阴书”,将文书通过分解再组合的办法,进行密码编码。

其次在情报获得后保密。《孙子》认为,“三军之事,……事莫密于间”(《用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主张用兵要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让敌方摸不着头脑,连隐藏再深的间谍也窥探不到,最终没人能知晓取胜的原因。为此,《孙子》制定了严格的情报纪律:“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用间》)。就是说间事未开展前已泄密,间谍和知情者都须死。《六韬·阴符》规定,“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二是严格控制情报的知悉范围。为了保密,煞费苦心,甚至走极端,以至于对士卒进行愚弄。“(将军)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人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②《李卫公问对》中一再有“卿宜秘之,无泄于外”、“勿泄也”等告诫语句。

纵观《武经七书》中的军事情报思想,对情报来源、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是深刻而全面的,至今在认识论上仍不乏启迪与指导意义。书中情报收集的内容广泛而全面,收集手段是与当时战争形态相适应、较为单一落后的人力侦察,情报分析辩证深入,情报应用思想灵活多变。

^① 见《阴符》。

^② 见《孙子·九地》。



《武经七书》中的情报思想基本总结了我国古代情报工作的经验,代表了我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正确反映出了当时军事情报工作的水平与形态。但毋须讳言,囿于时代限制,其中仍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就《孙子》情报思想的局限而言,第一,在论述情报价值时,尤其是强调“知”的作用时有绝对化的倾向,认为只要“知”了,就能“百战不殆”,只注重作战指挥对情报工作的依赖,忽视了作战实施这一根本要素。书中说:“凡此五者(按:道、天、地、将、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其实,“知”未必一定取胜。该书还过分强调了用间的作用,以为间谍无所不能。书中指出:“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把殷周两个朝代的兴盛看成是重用了通晓前朝情报的伊尹、姜子牙的结果。第二,有轻视愚弄士卒的倾向。为了保密,《孙子》主张将帅“愚士卒之耳目”,使其无知无识,对待他们,“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九地》)

从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总体情形看,我们应辩证认识到以下局限。

情报思想缺乏体系性。《武经七书》中缺乏严密完整的情报理论体系,情报工作并未得到很好总结。原因有三:首先,在古代军事工作的流程中,情报未被看成单独的重要环节。至于军事斗争的组成要素,往往粗疏地、并不科学地分成为将之道、作战指挥、训练方法、行军驻扎须知、谋略应用、军事纪律等等,忽略了这些要素间关系的梳理。在研究如何统率指挥、施展谋略时,尽管把情报工作作为制定谋略、进行决策的前提,但有时情报应用过于轻率,往往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灵机一动。可见,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尚不够成熟,缺乏对情报工作的自觉反思。其次,《武经七书》多是对话体,或以第三人称写作,文章结构就决定了它们缺乏理论性。惟有《孙子》辟专章《用间》,《吴



子》有《料敌》一篇来专题论述军事情报工作,其他各书均无成体系的专门论述,情报论述多是零星的。并且,其他各书中的军事情报内容在全书中的比例都并不高,多的不足五分之一,少的不到十分之一。《三略》涉及情报的内容最少。第三,《武经七书》以哲理喻兵,从总体上对战争规律进行哲学概括,多以精炼的语言提出格言式论断,“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其中的军事情报思想与古代军事思想的其他内容一样,缺少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与古代兵书总体上缺乏理论色彩的特征是相契合的。进一步说,这与我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

情报研究的分析性不强。不少论者在比较古代中西军事传统时指出,古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当时军事理论形态的不同。西方偏重逻辑推理,求实索真,强调局部、微观的分析;而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注重谋略,强调宏观、整体的指导意义,主张因情用兵,灵活机动,推崇哲学思辨、直觉顿悟。^①李泽厚先生对我国古代兵家的思维方式作了精辟概括。^②他认为,兵家思维的具体现实性和实用性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单纯是经验的归纳和观念的演绎,而是以简驭繁,从宏观上综合考察事物,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迅速、直截了当地来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选择。这种直观把握方式,长于综合、短于分析,长于意象顿悟、短于逻辑思维,是一种笼统性、经验意会的思维方式。在具体论述上,常采取寓理于事的方法,从直观入手,形成含义精

① 参见姚有志:《古代中西军事传统之比较》,载《中国军事科学》1995年3期;朴民:《本世纪孙子研究述略》,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8期。

② 参见李泽厚:《孙老韩合说》,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81~83页。



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外国同期无一可同日而语者,时至今日外国人依然赞叹不已。但是到了近代,中国军事思想远远落后于外国。中国资产阶级的军事思维零散而无创见,一些肤浅之论也多是拾人牙慧。

专门研究情报工作理论和方法的现代军事情报学,是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立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情报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军事情报工作。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军事情报学在现代军事理论体系和战争实践中的地位日趋显要。但它无论就体系还是内容来说都远远谈不上完善和丰富。而在现代情报学引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传统的情报观念重点恰恰集中于军事意义。比如,中国人关于情报的最早定义,就是专指军事情报,并视之为军事领域特有现象。1915年10月版的《辞源》定义情报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1939年10月出版的《辞海》则说:“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5年,修订版的《辞海》在释义上才略为宽泛:“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导,如科学技术情报。”

毛泽东军事情报思想^①是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逐步形成的。

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毛泽东军事情报思想产生与形成的重要标志。该文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其中对军事情报从获取的方法到分析、

^① 参阅肖占中、刘昱《军事思想与军事战略》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4月,99~105页。



研究、判断、处理的要求,都有完备的论述,自成体系。毛泽东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周密地组织侦察是实施正确指挥的先决条件,而且精辟地论述了“部署”、“决心”、“判断”和“侦察”四者的辩证关系,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就是情报分析的科学方法。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情报思想伴随其军事思想走向成熟,其核心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思想和大众情报思想。

毛泽东军事情报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周密地组织侦察,是实施正确指挥的先决条件。指挥员亲自进行侦察和掌握敌情,是准确判断情况,正确定下决心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刘伯承一贯坚持“知己知彼者,方能战”的用兵原则。他非常重视战前的调查研究,熟悉掌握敌我全盘情况。他把战前准备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谓之“五行术”。指出:“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非常形象地强调战前情报准备工作的重要。

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一贯强调,指挥员要充分发挥军事侦察力量的整体作用,灵活运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如组织谍报侦察、技术侦察、军队侦察、群众侦察,研究敌人报纸和通讯社的报导等,多方获取情报。抗战时期,在毛泽东的武装部队军事侦察与群众性侦察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各解放区普遍建立了以民兵、自卫队为骨干的大众情报网。

(二)侦察和情报分析贯穿于战局的始终,是战争发展进程



第二节 外国军事情报思想史

一、外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概述

考察外国军事情报思想,不能脱离外国军事思想这一大环境,进而也不能孤立于外国军事思想的总体特征之外。外国军事思想的发展的轨迹与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一样曲折,但轨迹不一。其全盛期在近代,古代军事学术水平低下,到了现代,虽然在高技术条件下对战争力量建设和运用等方面提出了较实用的军事理论观点,但在军事思想的世界观层次上并不出色^①。

由于外国古代史籍对历史的记叙以战争活动为主要线索,其古代军事思想主要保存在史书中,专门的兵书至近代才出现。史籍保存了外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却又使这些军事理论缺乏系统性,理论化程度不高、对战争的一般性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显得不足。

在外国古代,军事思维层次较低,未出现一部成熟的、可称之为“兵书”的著作,他们将军事著述与史学著述混为一谈,未能按照军事理论的内要逻辑要求来构建兵学理论大厦,只是在战争事件与神话传说中夹杂着军事认识。除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卢战记》等战史性的文献中偶尔能看到军事思维的火花闪现外,就只能在古代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去搜寻只言片语了。并且外国军事情报思想远没有中国的丰富深厚,出现过军事思想的断裂期,如恺撒的《高卢战记》标志着外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终结。在此之后的1700多年里,外国几乎没有出现过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这种断裂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以后的工业文明时代。从俄国的彼得一世、拿破仑,再到华盛顿、

^① 参阅张俊波主编《中西军事哲学比较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诡计,而是自己的勇敢和忠诚。”^①

古罗马的兴起使外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逐渐走向兴盛。这一时期的军事著作主要仍是一些军事历史著作,比较著名的有恺撒的《高卢战记》、韦格蒂乌斯的《兵法简述》和弗龙蒂努斯的《谋略》。

古罗马伟大军事家和政治家恺撒,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军事名著,将古罗马军事思想推向高峰。《高卢战记》开始将军事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注重军事技术和兵器的创新和发展。在情报思想方面,注重侦察敌情,把全面深谙对手作为选择作战目标和作战方法的可靠依据,同时善于针对敌之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出奇制胜。如,当敌人的撤退像溃散时,“恺撒马上就从他的侦探人员那边得知消息,但因为没有了解他们撤退的理由,深恐有埋伏,故而把他的军队和骑兵留在营中不出动。天明时,这消息得到侦察部队证实,他才派骑兵去骚扰他们的后队。”^②

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一书特别重视情报工作,其中《隐蔽己方计划》、《刺探敌方计划》、《策反用间》、《反间》等章从战史的角度专门论述了情报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情报搜集、应用方式。《谋略》实为一部军事活动特别是谋略实例的分类集,概括出了许多用兵法则,在情报认识上特别强调了策反用间问题。如,“当他(汉尼拔)被告知前一天夜间他的有些战士叛逃的消息,并获悉在他的军营中潜藏着敌人的奸细时,便大声宣告,不能把按照他的命令跑到敌人那边探听对方企图的那些最勇敢的战士叫做‘叛逃者’。潜藏在汉尼拔营中的奸细听到他的公告之后,立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131页。

② (古罗马)恺撒:《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50页。



即将其报告给自己那边的人。于是罗马人把那些叛逃者抓起来,砍断他们的双手,再把他们赶走。”^①

韦格蒂乌斯的《兵法简述》将情报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善于正确判断敌我双方实情的将领将立于不败之地”,“最好的计划是直到你付诸实施之前,敌人对此一无所知者”,并视之为一切交战和征战的主要规则。书中还强调要搜集敌军统帅和将领的性格特点、敌我士气等情报。^②

(二) 中世纪时期军事情报思想

在中世纪,其前期政治上分裂闭塞,经济上封建割据,宗教神学统治人们的心灵,文化思想被禁锢,军事思想少有创见。中世纪后期,欧洲进入复兴时期,军事上也随着思想解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走向兴盛,军事思想迎来近代社会的曙光,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军事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等^③。马基雅弗利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学观念的束缚,对战争的认识由神社转向人间,堪称近代欧洲军事思想的重要开拓者,因而在中世纪军事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识到战争与政治之间有一种非常严格而密切的联系;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肯定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辩证法来观察分析军事事物,他对军事力量的源泉、使用及其局限性的论述给后人很大启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一生战功卓著,著有《战争原理》。他主张以出敌不意的攻击发起战争,作战讲究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大胆机动、灵活作战,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斜楔阵法”战术,提出了著名的内线战略。

① (古罗马)弗龙蒂努斯:《谋略》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162 页。

② (古罗马)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版,115 ~ 143 页。

③ 参见梁必骏:《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 4 月,52 页。



搜集过程中,“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进而强调情报分析判断的必要。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又说,“通常,人们容易相信坏的,不容易相信好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像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像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重现。指挥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像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① 诚然,客观、正确的情报不是轻而易举即可获得,但过分地强调情报的不确定性,悲观地看待情报的客观性,过分强调指挥员的辨别能力与判断能力的重要,实际就是在实践上否定了情报在作战和战争中的可知性和客观性。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情报观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在拿破仑战争时代情报获取的技术性不强,情报活动的成效尚未得以充分展示。

瑞士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对军事情报问题较之《战争论》有着精辟的论述。该书重视情报搜集工作,阐述了为弥补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而开展情报活动的必要性。指出在军事行动之先,“必须切实掌握敌人行动的情报”。“在缺乏可靠而精确的侦察材料的情况下,一位能干的将领是从不轻举妄动的。”“如果不了解敌人在干什么,又何以确定自己应该干什么呢?”因此“一位将军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掌握敌情这件大事”。书中尤其注重战略情报的搜集,指出,“决不可忽视搜集有关邻国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的情况,以了解敌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物质能

^① (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93~94页。



力和精神能力,并判明敌我双方在战略形势上的优劣”。^① 该书第二章《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中专门提出制定战争计划必须充分考虑的情报内容:“敌对民族的战斗意志、军事组织、现役兵力、预备兵力、经济资源以及他们对本国政府或国家制度的忠诚程度;国家领袖和军队长官的特性和才干,以及政府或军事委员会在首都能对战争的进行所施加的影响;敌军总参谋部所遵循的主要作战原则,双方军队的兵力编成和武器装备;所企图入侵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实力统计;一切资源及一切可能遇到的障碍。”但获取敌情并不容易,因而要多方搜集情报。情报搜集手段包括组织侦察,派遣间谍,火力侦察,规定信号,审问俘虏。同时要注重情报积累,从相互矛盾或不完整的情报中分析出真实情况,在情报应用时应审慎,不能过分依赖情报。

其后的军事理论家都继承了《战争论》和《战争艺术概论》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情报思想。如,英国富勒《装甲战》^② 认为,“情报是战斗的基础”,侦察的首要原则就是应不间断地进行。在机械化战争中,机动力的增强将会使情报的有效时间缩短,同时,飞机和无线电的通信的发明将在一定程度上驱散“战争迷雾”;但是这时由于战场动向变化加快,从空中和地面获取的情报往往会自相矛盾,令指挥员不知所措,“战争迷雾”依然浓厚。这一情形下,类似敌人不在某地的否定性情报已比矛盾重重的敌人在甲地、乙地等肯定性情报更为重要。闪击战的创始人古德里安在《坦克——前进》中特别强调战术情报的搜集,指出侦察和警戒不力致使德国在二战许多战斗中失利,进而提出了十

① (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00~305页。

② (英国)富勒:《装甲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四种“伪装和制造错觉”的办法和七种“欺诈手段”^①。

进入现代以来,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争对情报的依赖更为迫切,外国军事情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情报技术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在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重视指导情报实践的情报方法,对情报的学理研究不够,多就事论事的经验总结。伴随着工业时代被信息社会取代,军事理论也逐渐由机械化战争理论向信息化战争思想过渡。情报理论研究没有停滞,反而加速向前发展。军事家们在对军事情报的认识上比以往更加深刻,情报应用更加广泛深入。虽然在理论上的创新之处不多,但对情报重要性的认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对情报搜集分析运用等各环节的研究更为精确细致。托夫勒的《未来的战争》即指出,精确的情报比精确制导的武器更重要。柯林斯的《大战略》认为,任何战略估计都必须研究“敌人能采取什么行动,敌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敌人突出的弱点是什么”这三个基本的战略情报。现今美国的情报理论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美军较早地将情报战体系融入信息战之中,美军的信息战理论研究,成为各国竞相关注并跟进研究的重点。

^① (德国)古德里安:《坦克——前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165~168页。



围和重点,分清主次缓急。要重点搜集直接影响本国利益的军事、政治及经济等情报,重点搜集重要敌性国家及地区的情报资料、反映重大动态情况的情报资料和系统反映基本情况的情报资料。和平时期军事情报的搜集应以敌对国家的战略情况为重点;战争时期,应以搜集敌方兵力、部署、火力配系、后勤保障、作战企图、作战方向、进攻时间等方面的情况为重点。

(三)点滴积累

军事情报搜集是一项长期任务。充分详细的材料需要长期积累。零碎杂乱是情报材料固有的特点,在搜集时要不厌其烦,应重视点滴,逐步积累。对于侦察对象较为固定的各方面情况,应建立详细档案,点滴积累,并分门别类地加以保存,以备查用。

二、搜集内容

(一)军事情况

军事情况是军事情报搜集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建军方针、军队现状、军费开支、战场建设、编制体制、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作战思想与方法及特点,各军、兵种战役、战术、作战原则、任务,核武器及其他新式武器的性能和配置,陆海空军事基地、港口、机场、导弹发射基地、防空设施、首脑机关、后勤保障、战备程度等。

(二)政治及外交情况

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受政治的影响和支配的,而外交既是其政治集团意志的具体体现,也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所以政治和外交情报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对象国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党组织、国家机构、国内政局、对外政策、外交关系以及外交动向等。

(三)经济及科技情况

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经济、科技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的军事力量的根本在于经济和科技实力。因



此经济和科技情报也是军事情报要搜集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国民经济、国民收入、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对外投资贸易、经济资源,科学研究、应用研究、尖端技术、军工技术、革新发明等情况。

(四)地理情况

查明侦察对象的地理情况是制定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的重要前提。这些内容包括对象国领土、区划、城镇、交通,地形、地貌、河流、水文、气象等情况。

(五)社会情况

包括民族、宗教、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情况。

三、公开军事情报搜集

在军事情报搜集中,公开情报搜集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公开情报搜集是指从公开的资料或消息中获取情报的过程,是情报搜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情报机关的情报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公开的资料中可以包含秘密甚至是核心秘密。一些公开的、不被一般人注意的零散材料,经过情报分析人员整理、加工、分析、综合,就会变为价值很高的情报。公开情报搜集不仅能获得一般性情报,而且常常能获得战略性情报,所获得的情报往往具有全面、系统、清晰等特点。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新的媒体大量涌现,信息的开放程度增强,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不断向开放发展,过去严加保密的领域和地区减少,因此公开情报覆盖的范围扩大,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从而为军事情报搜集提供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因此,各国都设有专门搜集公开情报的部门。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在自己内部都设有公开情报搜集部门。日本防卫厅所设的中央资料队是日本最大的公开情报活动中心。德国的新闻情报局直接受政府总理的领导,其局长享有参加内阁会议的权力,它除搜收 26 家通讯社、73 家电台、电视台的情报性新闻



部秘密发展人员,以获取机密情报的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称为间谍。利用对方营垒里的间谍收集情报信息,这虽然是古老的情报手段,但在现代战争的筹划准备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间谍利用在敌人内部的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方法搜集敌方情况,常可获取价值较大的情报,有时甚至是核心机密的情报。在东西两大阵营长期对垒的冷战期间,双方一直在积极地培训派遣与招募间谍进行情报信息的搜集活动。美国曾利用华约司令部内的波兰高级军官提供的情报,掌握了大量华约组织的绝密级军事情报。谍报侦察的主要目标是侦察对象的决策和要害部门,以获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等核心机密情报。间谍侦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隐蔽性。谍报必须以合法、公开的形式掩护自己的真实企图,秘密进行情报活动。二是艰巨性。谍报侦察要深入敌人内部开展情报活动,一切活动都在对方的视线之内进行,难度很大,任务艰巨,而且要冒很大风险。三是长期性。间谍侦察须深入敌人要害部门,一般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取得信任,长期潜伏,活动得当,才能持久地搜集到机密情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基本做法是建立谍报网,采取观察、刺探、密取、窃听、引诱和恐吓等方法招募间谍和获取情报^①。

二、武官侦察

武官是派驻在使馆里对外代表本国武装力量的外交官,是大使的军事顾问和助手。各国通常也把武官看作军事情报人员。武官所担负的情报任务是:观察和研究驻在国和有关地区的基本情况和战略动向,通过外交、社交、现场观察、资料搜集及情报交换等途径搜集情报。由于武官的情报职责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其行动处在对方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其获取情报的能

^① 见阎晋中著:《军事情报学》,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力受到较大的限制。

三、无线电技术侦察

此种侦察是使用技术设备截收对方发射的各种无线电信号,从中获取情报的活动。其中包括通信信号侦察和非通信信号侦察。

(一)无线电通信信号侦察

通信信号侦察是使用无线电收信器材,截收对方各种无线电通报、通话信号,通过对密码、密话的破译和对通联特点的研究,以及对电台进行测向定位等方式,直接获取对方的有关情况。无线电通信侦察包括侦听和测向定位两个方面。

1. 无线电通信侦听。无线电通信侦听主要是运用电波传播、信号及联络三个规律来实施侦察,它能够在不知道敌方通信地点、通信制度、工作频率、调制方式和记录方法等情况下,实施并完成无线电通信侦听任务。侦听设备主要是无线电接收机。

(1)电波传播规律。不同波段的无线电波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因此具有不同的传播机制。如超长波、长波利用地波传播,对岩石和海水有一定的穿透力,一般适用于对潜艇通信、远洋通信、地下通信及海上导航等。中波以地波传播为主,天波为辅,主要适用于广播、航海、航空通信及导航等。短波以地波方式传播时,由于波长较短,衰减大,通信距离较近;以天波方式传播时,由于经过电离层反射其损耗远小于地波传播,所以即使使用较小功率的电台也能传播较远的距离。超短波通信主要靠空间波进行视距传播。若用鞭状天线靠地波传播时,通信距离就很近,仅适用于战术通信;利用空间波传播时,应用高架天线或将电台设在高处,通信距离较远。当需要超视距通信时,可采用接力、卫星和散射的方式;微波类似于光的直线传播,对障碍物绕射能力很弱,适用于视距内空间波通信。当需要长距离通信时,同样可采用接力、卫星和散射的方式。微波散射通信



手段。随着无线电通信对抗技术的提高,要准确地测定敌台的位置,需采用多台侦察测向机在不同的角度对敌台进行交叉测向定位。无线电通信测向的种类较多,按显示方法不同可分为听觉测向和视觉测向;按使用方式不同可分为固定测向、半固定测向和移动式测向;按测向机的用途不同,又可分为空中测向、海上测向和地面测向;按适用波长不同又可分为长波测向、中波测向、短波测向和超短波测向等。

(二)无线电非通信信号侦察

非通信信号侦察主要是通过对对方雷达、导航、制导、遥控、干扰等无线电信号的侦测、分析、判断,查明其电子器材的类型、数量、用途、位置及有关技术,进而判断对方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等情况。

无线电技术侦察可根据情报搜集任务和对方无线电波辐射情况,由地面侦察站、电子侦察船、电子侦察飞机、电子侦察卫星和投掷式自动化电子侦察设备等实施。此种侦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侦察距离远;二是获取情报速度快;三是所获情报比较准确、重要;四是隐蔽、安全;五是较少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六是平时和战时都可不间断地进行。

四、卫星侦察

卫星侦察是指使用载有侦察设备的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的侦察。用于获取情报的人造地球卫星叫侦察卫星。侦察卫星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光电遥感器或接收机等侦察设备,从轨道上对目标实施侦察、监视或跟踪,以搜集关于地面、海洋、空中目标的情报。侦察设备搜集到的目标辐射、反射或发射出的电磁波信息,用胶卷、磁带等记录贮存于舱内,在地面回收,或通过实时或延时方式传输到地面接收站,再经光学设备和电子计算机等处理,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情报。侦察卫星主要用于战略侦察,也可用于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侦察卫星既可以对地球表面进行大面



号转换成为电信号,然后再将电信号放大,并用它去推动发光体发出可见光。微光夜视器材,主要有微光夜视仪和微光电视两种。微光夜视仪又叫作星光瞄准具,它是通过对微光敏感的材料直接接收物体反射的夜天光并显示出来的装置,所以又称做直视式夜视仪。在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微光夜视仪就为英军的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夜战中英军能清晰地观察阿军及其阵地,并对其进行准确的射击,而阿军只能盲目地射击。微光电视实际是像增强技术与电视摄像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主要由摄像机、显示器和控制器三大部分组成。它可以把像增强管荧光屏上的图像再转换成电信号,传输到远处,显示在电视屏幕上,并且可供多人同时进行观察和实施战场监视、武器制导。微光电视的图像清晰、视距远,在良好天气条件下,微光电视摄像机的作用距离可达10多公里,并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和机动性。

八、可见光遥感侦察

可见光遥感装置是用来捕捉目标在可见光频谱内辐射和反射的电磁波信息的探测装置。常用的可见光遥感装置主要有照相机和电视微像机。在现代军队中,绝大部分情报侦察工作是由空中平台和太空平台的可见光遥感装置来完成的。与其他遥感装置相比,可见光遥感的特点是:地面分辨率高,目标直接显现在屏幕或胶片上,直观清晰,容易解析、识别。可见光遥感装置的缺点是在夜间和气候恶劣时无法使用,而且不能识别经过伪装的目标。

九、多光谱遥感侦察

多光谱遥感是将目标辐射或反射的各种波长的电磁波划分成若干窄的波段即光谱带,在同一时间内用几台遥感装置分别在各个不同光谱带上对同一目标进行照相或扫描。对所得的图像或数字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对比,即可鉴别目标。如在多光



谱遥感的合成图像上,生长旺盛的植物呈红色,伪装用的植物呈灰兰色,金属物体呈黑色,这样,就可将经过伪装的目标识别出来了。多光谱遥感装置在军事领域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但它的分辨率低于可见光遥感装置。

十、激光探测侦察

激光是由激光器所发射的光,是处于激发状态的原子、离子或分子受激辐射产生的,而普通光是自发辐射产生的。激光具有普通光所没有的相干性好、方向性强、亮度高及良好的单色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它独特而广泛的军事应用价值。激光探测装置正是运用激光的上述特性,达到精密测量、探测和制导的目的。其中包括激光测距仪、激光雷达、激光制导装置等。激光测距仪是利用射向目标并被反射回来的激光束进行测距的($L = 0.5CT$),广泛用于地形测量及对云层、飞机、导弹和人造卫星距离和高度的测量。激光雷达除可以测距之外,还可以测定目标的方位、高度、运动速度和进行跟踪,有很高的精度。激光制导主要用于导弹、制导炸弹、制导炮弹等制导武器。激光制导是继雷达制导、红外制导和电视制导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精确制导技术。美军在侵越战争中,使用普通轰炸方式攻击地面点状目标时,平均投放 210 枚炸弹才能命中 1 枚,而使用激光制导炸弹后,命中率高达 61%。激光制导的弱点是容易受气象和战场条件的影响,易暴露,缺乏自动搜索能力等。

十一、声学探测侦察

在现代军队中使用着多种探测声波信号的信息装备,包括声纳、炮兵声测设备、窃听器和地面传感器等。

声纳(声导航与定位)是利用声音在水中的传播原理对水中目标进行传感探测的信息技术装备。声纳的主要用途有:(1)对水中目标搜索、测定、识别和跟踪。(2)进行水声对抗。(3)水下战术通信。(4)导航及水下武器制导等。其原理是将水声信号



号发送至附近的转发电台,再由功率较大的转发台将信号发送至更远的接收电台,然后再将电流信号还原为话音。第三种是用远距离感应式窃听器窃听。这种窃听设备不仅可窃听几十公里远的载波电话,也能窃听几百米远的明线电话。

地面传感器是一种辅助性战场及纵深地区的侦察与监视手段,它能对地面目标运动所引起的电磁、磁、声、地面震动和红外辐射等物理量变化产生的信息进行探测,自动或根据遥控指令,以无线电或有线电传输方式,将信息通过中继转发器传送至监控装置,使情报部门及时获得敌方目标的运动信息。它弥补了雷达和光学侦察系统的不足,不受地形和气候的限制,具有实时、隐蔽和不间断的自动侦察与监视功能,扩大了战场信息探测的时空范围。地面传感器可分为震动传感器、声响传感器、磁性传感器、电磁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和应变电缆传感器等。

第三节 军事情报识别

军事情报识别是情报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情报识别实质上是对情报材料的价值作出鉴定,对情报材料的功能作出推断,以便廓清认识,为情报材料的处理奠定基础。

一、识别内容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指情报反映的情况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真实性是情报的生命。不真实的情报,也就是假情报,会造成用户认识上的混乱和决策的失误。“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①造成虚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93 页。



接利害关系的战争,因而有关情报对我有直接的针对性;而中东战争、海湾战争等与我国无直接关系,但对我国国家利益仍是有影响的,因而有关的情报对我具有间接的针对性。

二、识别方法

识别情报必须从情报反映的事物情况与其他有关事物情况的联系中、从情报所反映事物自身的特性中去识别情报,因此识别情报的主要方法相应有关联系比较法和要素分析法。

(一)联系比较法

它是在情报反映的情况与其他有关情况的比较中识别情报的方法。

一是联系对象情况进行识别。一份情报所反映的情况总是同所涉及对象过去的情况或基本情况有联系,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一定的背景、条件和相关因素,都不是孤立的,它必然有前因后果,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在识别情报时,应注意把情报反映的情况与已经掌握的情况进行联系比较,从而作出鉴别。运用此种方法识别情报的重次、急缓时,重点要看情报在有关领域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及其有效时限,而识别情报的真假、正误时则主要看情报所反映的对象情况是否与当时所掌握的情况相符合,是否符合所涉及的对象的政策及有关规律等,如有不符,则通常是虚假或错误的情报。

二是联系有关知识进行识别。有些情报,特别是一些内容专业性很强的情报,需要联系有关知识来比较鉴别。例如,经贸情报、科技情报,如果不懂得相关的知识,甚至连报文内容都看不懂,更不用说进行价值识别了。对政治、军事、外交、安全等情报进行识别时,也都需要有相关的知识作为基础和参照。

三是联系当时的形势进行识别。即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情报进行识别,看其与形势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问题的关系。如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时,与其相关的情报是有关部门特别



关心的,特别是反映国际形势的最新动态及动向的情报,就是重要的、紧急的情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发生时的有关情报是当时有关部门十分关心的情报;反映侦察对象国内部最新形势的情报同样是比较重要、紧急的情报。

四是联系重大活动进行识别。有些情报需要联系国际国内进行的重大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活动,把所获情报与重大活动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如果情报反映的情况与当时的重大活动有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重要的。特别是与我国重大活动直接有关的情报,其重要性和紧急性就更加明显。

要素分析法是从分析情报各要素的性质、特征及相互关系来识别情报的方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析情报来源。情报来源是指情报内容的反映者。由于反映者不同,可分为直接情报和间接情报。直接情报指反映者反映本身的情况,如军事情报中反映者反映自身的作战计划、命令、战况报告等;外交情报中反映者反映自身的指示、请示、报告等;特务情报中反映者反映自身的行动计划、命令等。间接情报是指反映者反映非本身的情况,如军事情报中反映者反映敌方的情况,外交情报中驻外使节反映驻在国的情况,特务情报中反映者反映被策反对象所谈的情况等。一般来说,直接情报比间接情报重要、可靠。

二是分析情报涉及的对象。通过分析情报涉及的对象识别情报的重次、急缓,就是要分析情报涉及的是主要敌性国家还是一般敌性国家,是友好国家还是与我关系一般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权威人士或决策机关还是一般人员或执行机关。一般来说,有关前者的情报要比有关后者的情报重要一些,时效也紧急一些。通过分析情报涉及的对象识别情报的真假、正误,就是要分析情报涉及对象的名称、职务或身份等表达是否正确、是否前后矛盾等。



要,向情报研究部门提出情报研究的具体要求和课题,这种课题层次高、要求严,不仅要求有事实有观点,还要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或看法;二是情报部门提出课题。情报部门都具有特定的任务,可以说,大部分研究课题是情报部门自己提出的,一般每年都制定研究计划和研究重点。三是研究人员自选课题。研究人员根据有关政策和需要,在自己丰富的积累基础上,根据形势需要自己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3. 选择依据。一是依据上级首长和部门的指示精神提出课题,情报研究人员必须深刻领会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首长讲话或下发文件的精神,以此为依据主动地提出课题加以研究;二是依据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活动提出课题,以满足这些活动的情报需求;三是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课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经济等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要及时对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作出判断;四是依据情报资料的占有情况提出课题。军事情报素材积累到一定阶段,往往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研究人员对占有的材料要自觉地进行整理和研究。

(二)搜集情报材料

一是要清楚与课题有关的概念,只有明确了概念,才能搜集有关资料,如有关军事概念、术语都有特定的含义,各国部队都有统一的规范的军语,必须在明确它们的准确含义的基础上去搜集材料;二是要搜集与课题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如原文、原话、原报。掌握直接的情报材料可以避免由于环节、层次多甚至道听途说导致的真伪难辨状况,从而保证情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三是要手脑并用,多动手,多留心,多积累。四是区分主次。搜集材料主要是搜集重点、直接的材料,而不应主次不分,重点不明,盲目的贪多求全往往给研究工作带来麻烦和干扰。对骨干材料要搜全搜细,对有关材料则要作出选择。



(三) 鉴别情报材料

鉴别情报材料就是针对课题的需要,从搜集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各种来源的情报材料中,经过比较鉴别,判断分析,选择课题所需要的材料,为情报分析研究奠定基础。情报材料的鉴别应主要从情报材料的可靠性、新颖性和适用性三方面考虑。

(四) 加工情报材料

加工情报材料就是在搜集和鉴别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筛选、分类,使其条理化、系统化,进而吸收、分析、判断的过程。即在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形成比较明确、完整的概念,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从而提炼出有价值的情报。

二、军事情报研究的内容

(一) 军事战略研究

军事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对立国的军事战略动向,是为战略决策提供情报保障和战略预警的重要内容。一国的军事战略是根据对战争规律和敌对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的认识确定的,它规定着对战争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因为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与周围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政治、经济、精神、地理等因素必然对军事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或制约作用。政治是军事、经济、外交等的集中体现,政治可以通过国家机器,运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可以通过外交斗争,争取同盟者和国际社会援助等,这就决定了政治必然是制定军事战略的前提,对军事战略有多方面的影响。经济是一国生存、发展及其综合国力的基础,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强弱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强弱,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同时也会引发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变化。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手段的出现,必然引起作战样式、方法的改变,



从而产生新的军事战略。精神因素主要指人心和士气,即国内人民的人心向背和军队士气的高低,以及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精神因素在任何战争中都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直接影响到战略企图和战略行动。地理因素指一国的自然环境因素,包括山地、平原、江河、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它对军事战略有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军事战略,如四面临海的岛国就必须重视发展海军和空军,确立以海军、空军为主的军事战略。同时,一国的地形对军事战略也产生影响,各国可根据不同险要地形地势,制定相应的军事战略。

(二)军事潜力研究

战争潜力主要表现为军事经济潜力,即存在于军事经济基础中可以转化为现实军事经济力量的那部分经济能力。一国的军事经济潜力,是该国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最大经济力量,它反映该国军事实力可能达到的最大限量,标志着一国能够进行国防和战争的潜在经济能力。这种潜力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国防经济生产总量、战时经济生存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等。战争潜力的具体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及其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状况;经济制度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管理能力;工业特别是对保障战争需要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工业各部门的能力;各种交通线的密度、分布和交通运输状况;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国民经济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战时所使用的对外交通线的可通行程度;动员国民经济各部门可能需要的时间;经济资源的数量及利用能力;国家的物资储备状况、劳动生产率水平等。对敌国的战争潜力进行深入研究,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的目的、性质、规模、军事行动展开时限等方面进行研究,这是情报研究部门的重要职责。

(三)战争危险研究



鉴别、归纳、综合、演绎、推断、论证,从而得出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结论的研究方法。逻辑方法具有规则性强、简便灵活、推理严密、定性分析等特点。下面主要讨论一下比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方法。

1. 比较。比较法是确定事物之间异同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思维方法。比较是人们认识和鉴别事物的基本方法。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比较法也就是要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通过比较,才能把杂乱的情报材料分门别类,从而作出鉴别,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比较有数量比较、质量比较,外形比较、结构比较、层次比较、功能比较,原因比较、结果比较,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等。如某一时期中国人均国防开支与美国人均国防开支的比较是横向比较,而美国各个时期人均国防开支的比较则是纵向比较。具体从什么角度比较,取决于具体情报研究的需要。由于军事领域充满着竞争与对抗,具有明显的对比性,因此,比较方法在军事领域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获取情报、信息和科学事实的过程中,要通过比较加以鉴别、辨认、整理,进行加工;对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是确定军事战略战术的重要依据;通过军事斗争历史的纵向比较和军事发展的横向比较,可以从差异中找出同一而获得共同规律,或从同一中找出差异而发现特点。比较只能达到认识事物之间异同的目的,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之中。

在研究活动中常用的类比法即是一种比较法。类比法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之间在某些属性上相似,进而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逻辑推理方法。根据对象的属性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可以将类比法分为简单共存类比、因果类比、对称类比、共变类比及综合类比等方法。事物之间存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使事物之间既能进行属性的类推,又能使类推得出一种或然性的结论。类比不仅可以在同类事物之间进行,而且可



以在不同类事物之间进行,因此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能起到解释、启发、模仿等作用,使人触类旁通。如从一国的态度、措施类推其同盟国的态度、措施;从敌军本次作战方法类推其下一次作战方法等。类比法是军事模拟试验和军用仿生技术的逻辑基础,在进行物理模拟、数学模拟和功能模拟时,只有利用类比法才能将模型的结果类推到原型中去,只有依靠类比法才会引出仿生的思想和仿造种种仿生技术装备。但类推结论的或然性、不可靠性使类比法带有较大的局限性。

2. 归纳和演绎。归纳与演绎是研究一般事物与个别事物之间关系的逻辑方法。归纳法是经过分析、比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思维方法。归纳法使人的认识超出个别性而进入到一般性。所谓个别是指具有独立的规定性而相互区别开来的单个现象、事物和过程。所谓一般,则是表示个别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即这类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共同要素。事物、现象、过程都是个别属性与一般属性的统一体。归纳法表现在逻辑上就是归纳推理,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推理分为简单枚举法、典型归纳法和统计归纳法。简单枚举法是通过观察某类事物、现象中的部分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而未发现反例,从而得出该类事物或现象都具有此属性的结论,为提高简单枚举归纳法的可靠性,就要做到枚举的事例数量尽可能多,范围尽可能广。典型归纳法是通过解剖典型事例得出结论,因而对事例的数量及范围没有太高的要求,但要求事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战争的不可重复性和每场战争的特殊性,难于进行基于大量同类例子的研究,这时,对典型例子进行透彻研究,并从中推导出可能成为当代战争共性的一些结论,就成为一个重要方法。统计归纳法是通过统计计算从而得出一类事物中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所占的比例。不完全归纳法的结论超出了前提所能支持的范围,因而结论的正确性是或然的而非必然的。完全归



归纳法实际上是前提完全覆盖了结论的一种归纳,因而其结论带有必然性。当被研究的对象范围大、数量多时,就要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反之,就要应用完全归纳法。考查事物、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穆勒五法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归纳方法,但应用时同样要注意被考查事例的数量和范围。归纳法为情报研究人员从现象到本质,从局部到全局认识事物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用归纳法进行情报研究就是对所掌握的一定数量的同类情况加以抽象和总结,从中概括出结论的一种推理方法。比如,军事理论就是在描述战史和军事史中许多单个的、具体的事件之后,揭示出军事斗争中基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和机制。可通过近期多次战争都表现出高技术特点、都体现了制空权和情报保障的重要作用,推断现代战争都可能具有类似的特点。因为归纳法一般必须建立在大量事实之上,所以利用归纳法进行情报分析在资料 and 事实不足时就难以得出结论,而在作战中指挥员得到的情报通常是不充足的,而且战场情况变化急剧,特别是现代作战节奏明显加快,给及时准确地获取大量情报带来困难,因此归纳法的使用也有较大的限制。

演绎法一般是指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推理方法,本质上是指利用若干已知规律、规则和事实,通过特定的相关关系顺次地推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推理方法。它是一种由此及彼的研究方法,是通过间接、迂回、侧面的联系及合乎逻辑地论证来认识问题。在军事情报研究中,演绎方法用于探索未知、预测未来及证实和证伪某种观点。演绎法是最早引起人们关注并得到充分发展的思维方法之一。反映事物本质及规定性的各种定律、规则、原则、方针及各种事实能统摄大量个别事物和作为推论的依据,以它们作为前提顺次地进行推导就能得出有关事物的结论。在情报课题研究中使用演绎法通常有时间演绎和层次演绎。前者是由过去、现在推知未来,如从一国以往的作战或演习的特点推



是军事情报对时效性和预见性的特殊要求。但是,事物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除了具有同一性还有矛盾性,潜藏于事物中的矛盾的、非常规的因素,很难在演绎过程中得到揭示,因此,在使用演绎法时要注意它这种局限性,防止简单化。

3. 分析与综合。分析与综合是用于研究事物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逻辑方法。分析和综合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对事物认识逐渐深化的思维方法。所谓分析,就是把事物或现象分解成各个部分、方面、层次、要素、环节和阶段等,区别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掌握事物或现象的某些单纯的规定性,获得事物或现象某些侧面或某些关系的正确认识的思维方法。分析法是近代科学方法的主流,其代表理论是原子论、还原论,其特点是分解和追溯复杂现象和过程,直到最小的组成部分,其优点是可通过对点滴信息的透彻研究,获取重要和更多的信息,做到见微知著。其消极方面是重微观探究轻宏观整合,重部分轻整体。而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各部分在互相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体和系统,各部分结构和功能的简单相加并非就是整个系统,尤其是对国家、军队等复杂系统更是如此,在信息量激增的情况下,单纯的分析法难于把握整体和大局。正如《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和观点都被分析到了毫无生气的程度,在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结构,有了一个简单的结构,我们就可使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同时,随着世界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结构。”^① 这个结构就是指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综合方法。

所谓综合,就是在思维过程中将已有的关于认识对象的各个方面、部分、要素、环节和层次等联结起来,形成对事物、现象

^① 奈斯比特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中文版。



的整体、全面、统一认识的思维方法。客观事物只有经过综合、抽象、概括才能形成各种各样的类型和概念,从而形成关于这一类事物的完整普遍概念和本质认识。综合法是情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应用十分广泛。综合法根据课题的要求,从时间、空间和事件三个角度同时对课题进行整体研究,也可以根据不同要求,从其中一个或两个角度进行。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各种来源的分散片面、内容各异的情报按照特定目的进行汇集和整合,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情报,可使不同时间出现的、逐步发展的、与课题相关的情报系统化、动态化,使有关知识综合渗透,融为一体,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对象的本质,具有内容概括、统观全貌的特点。综合应建立在对大量情报材料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之上。综合法不是主观地、任意地对情况、素材进行牵强附会的组织与编排,不是简单地堆砌和罗列,而是按照事物内在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全貌。

在思维过程中,分析与综合在不同认识层次上的含义是不同的,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抽象思维中的分析与综合。即在认识事物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抽象思维的分析是在思维中把反映不同类事物的属性、要素区分开来。抽象思维的综合是根据事物的相同属性,在思维中将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统一起来。抽象思维的分析与综合是以客观事物的个别与一般等关系为基础的。二是辩证思维的分析与综合。辩证思维的分析与综合是客观事物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在思维过程中的反映。辩证思维分析的实质在于揭示客观事物各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并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研究,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辩证思维的综合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将客观对象的各种内在本质及其联系贯穿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整体,揭示事物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相



系统等,在这一大系统中,单个要素的强弱是次要的,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把各种要素合理配置起来从而使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才是重要的。高技术战争的大系统特性要求对它所进行的各种研究必须大力采用系统思维方法。

2. 控制方法。控制论是研究各类系统控制规律的科学。它以各类系统所共有的通讯和控制方面的特征为研究对象,探讨物质基础不同的系统所具有的信息交换、反馈、调节、自组织、自适应等方面的共性,对这些共性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以形成一整套适用于各门科学的共同概念、模型和方法。控制论的重点是控制方法。控制方法是施控系统如何实现对被控系统的控制,如何使被控系统按照施控系统的目的和要求来发展的方法,是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在一个控制系统中通过信息变换和反馈作用,使被控对象按照预定目的运行,实现最优控制目标的一种方法。任何控制系统都是由施控系统和被控系统两大系统构成的,施控系统是具有目的、行为、反馈、调节功能的系统,被控系统是施控系统的行为对象。施控系统通过自己的行为和反馈不断实现对被控系统的控制。控制问题在军事领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上级对下级实施控制和调节,下级对上级作出反馈,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控制系统。军事活动本身固有的风险性、多变性和随机性,要求军事控制做到严密、准确和及时。尤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战争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军队的战斗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明显提高,以及战场空间的超立体化和作战节奏的加快,使得军事信息繁杂多变,要求用于思维、决策的时间非常短暂,如何在极短的时间里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高效的、精确的计算、判断和控制,便成了军事斗争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各国竞相运用军事控制论的原理、方法研究作战指挥和武器控制等方面的问题,努力建立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四位一体的 C³I 系统。如美国早在 60 年代就开始研究



战前,敌对双方总是力求秘密准备,千方百计隐匿自己的企图,从而构成了两个大黑箱。战斗打响后,双方的作战行动实际上都是给对方的一种信息输入,双方的作战结果可视为对应某种信息输入的输出,这是能够观测到的。而作战的情报则是为了揭开黑箱的秘密,利用情报进行的决策、指挥和控制则是解决如何以最小代价的输入而获取符合自己利益的最大输出问题。

4. 突变方法。突变论研究某种过程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变迁,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方法,用以研究自然和社会领域的非连续性变化现象或过程。突变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用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系统描述和分析系统状态的变化,得出系统处于稳定状态的参数区域以及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的参数区域,从而证明参数变化时,系统状态也随着变化;当参数通过某些特定区域时,系统状态就发生突变。在战争中,为了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必须研究战场上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研究我方取胜、敌方溃败的突变条件,以此来安排火力、组织机动等。在国外,运用突变模型来分析敌对双方的作战态势怎样发生突变已成为一种潮流。他们运用突变方法研究攻方取胜、守方溃败的突变条件,研究攻方如何行动才能歼灭守方;为了预防崩溃,守方怎样部署方可增强生存能力等。在军事对抗领域,突变模型能借助不同的参数和变量分别代表蓝军兵力、红军兵力、火力平衡、指挥控制和双方生存能力等,能显示一旦由于红军、蓝军兵力增减等诸因素的影响而造成一方生存力突然降低的情况。突变模型在作战模拟中的优越性,为作战态势的分析提供了科学的量化依据。在军事领域突变类型可分为以优势兵力歼敌的兵力型突变,集中火力猛烈打击敌方的火力型突变,选择有利时机采取行动的时间型突变,选择或控制有利地域的空间型突变,采取灵活机智战法的方法型突变等。

(三) 创新思维方法



联想作为类比的进一步扩展能够克服两种事物或概念的差异和对立而使它们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创新性思维,它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德军通过望远镜发现法军阵地后面每天早上有一只家猫蹲在坟地上晒太阳。德军根据阵地附近没有村庄,一般指挥员又不可能在作战时养猫玩,因此联想到那坟地下面一定是个高级指挥所,事后证明确实如此。想像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创新思维活动,它是对记忆中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的一种形象思维。人们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在把握那些可被直接感知的经验性材料的基础上,去设想、构思材料所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图景,从而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爱因斯坦认为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人们常说,战争总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指挥员的脑海里展开,第二步才在战场上实施。并且在组织指挥作战的过程中,指挥员还要利用想象去理解别人提供的各种情报和掌握整个战场情况,借助自己记忆中的大量有关敌我双方状况的表象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地提出符合作战目的、要求和敌情、我情及环境条件的作战方案。

灵感也是重要的创新思维方法。人们对新知识的获得,既有经久的沉思,又有一时的顿悟,这种使问题突然得到澄清的顿悟就是所谓的灵感。二战中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后,不断用轰炸机轮番空袭列宁格勒的各个重要目标,局势十分严重,正当苏方束手无策之际,苏联一位科学家从一只躲在花草丛中的蝴蝶未被自己发现这一点,突然想到可以运用迷彩来保卫重要目标的道理,于是向军方提出了建议,苏军依照这种设想采取了伪装措施,果然收到了极好的防空效果。灵感并非自天而降,借助灵感获得新发现,都是在经久探索、思考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是知识



而应把它放在相关关系构成的大框架内进行考察,进行多方位、有目的和递进性的思考,将似乎毫不相干的信息联系起来,提出某种观点或结论,这样的思维就具有了发散性、跳跃性和超前性等创新性思维的品格。直觉方法的局限性在于思维的根据不太充分,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其认识成果显得比较模糊、笼统,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细化和完善。所以应当把逻辑方法和直觉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在解决某一问题时通常是先有一些直觉性的认识,而后还需要用逻辑方法对这些认识加以阐述和论证,在阐述和论证的过程中仍离不开直觉方法的运用。因此,直觉方法和逻辑方法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

第五节 军事情报预测

情报预测在情报研究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情报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预测。由于军事特别是战争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军事预测问题特别重要和突出。目前,预测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形成军事科学的一个分支,即军事预测学,它对于把握和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和机遇,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军事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要能科学地进行军事预测,一是必须立足于对军事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详尽地了解预测对象的历史状况和现实表现,并掌握科学的预测方法,这是进行军事预测的前提。二是必须依据对战争本质的把握。在军事史上,一切高明的军事理论家、战争预言者都是从分析战争的一般本质和各个战争的特殊本质入手来进行战争预测的。三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推断未来。这需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依据事实和超越事实的关系,即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又要敢于突破事实材料的种种局限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尊重已有理论和超越现有理论的关系,



国家其军事战略也有相似性,军事战略相似的国家其武装力量建设及作战方式方法等也有相似性。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历史事件是以往事件的重演,所以说历史经验值得注意,观历史可以知未来。一般来讲,在类属上比较接近的事物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同属大规模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相关原理

事物是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自然领域的生态平衡问题,社会领域内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相关原理的体现。利用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就可由一事物的已知状态推测另一事物的未知状态,由一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推测另一事物的发展变化情况。政治和军事之间,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是直接的、重大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国的政治主张、政治制度、政治意图和其军事战略之间关系密切。政治的本质决定着战争的性质,政治目的决定战争手段如何选择和选择何种战争手段。对别国实行军事打击、干涉和侵略常常是强权政治的选择。经济利益冲突常常引发战争,并且经济利益规定着军事斗争的目标、内容和手段。经济潜力对战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直接影响。而军事及战争对经济建设及发展的方向、重点和速度等也有很大的影响。军事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条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制约着军事技术向武器装备的转化。军事技术和战争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军事技术出现重大变化后,旧的战略战术就不能适应新的军事技术的要求,因此就会产生新的战争理论和作战方法。武器装备的质的飞跃必然引起战争理论的变革。武器装备种类的增多,必将促使战争理论趋于丰富。美国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就是基于其高新军事技术的优势,强调使用远程航空



队组织形式的演化。在战争中,新质武器的产生和发展,固然取决于一定的经济、科技条件,但决定其能否成为作战武器则在于是否存在着作战需求。其次,作战需求可直接影响军队的编制编成。武器装备虽未发生重大变化,但因军事战略战术的调整而导致军队编成发生变化的情况经常发生。美国为了适应与苏联抗衡的战略需要,立足于在欧洲打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因而将军队编成步兵师、装甲师、空降师三种类型。其后,因准备在欧洲、中东、波斯湾及东南亚等不同地区作战,又增编了机械化师和空中突击师。近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地区性冲突的上升,为适应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中、低强度战争的需要,又提高了高技术摩托化师和轻步兵师的比重。西欧各国也相应调整了其军队编成,形成了由防御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和增援部队构成的作战部队,其核心是快速反应部队。

(二)从各种征兆把握军事事件的发生发展

现象总是同本质相联系的。军事事件的发生发展常常给人以突然、意外的感觉,但实际上都是有征兆可寻的。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无论多么迅速,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战略欺骗措施无论多么周密,总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形迹。这些征兆和迹象包括制造舆论和借口,开展频繁的外交活动,以争取同情和支持;扩大军工生产;扩大征兵范围;提高战备等级;侦察活动增多;后方勤务活动增加;兵力靠前部署;封锁边境、疏散边民和城市人口;制造边境事端;通讯联络异常等。如德军对苏联发动战略突袭之前,德国报刊肆意渲染西方报刊所起劲报道的苏联准备进攻德国的消息,西方报刊同时也报道德国将进攻苏联。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前,美国总统里根就多次声称,美国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教训依附苏、古的格林纳达。美国袭击利比亚之前,也多次扬言: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惩罚其罪魁祸首卡扎菲。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两个多月,美国的侦察卫星就发现



了伊军向科威特边境调动和集结的情况。所有这些都说明,军事事件的出现不仅有征兆可寻,而且常常有很明显的征兆,只不过是由于没有进行认真的观察,或者是没有认真对待所得知的信息而错失机会。因此,只要认真观察、细致研究并认真对待有关的征兆,就能预见军事事件的发生发展。

(三)通过量变预测质变

事物的突变都是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的,不经过量的积累就发生突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军事事件也不例外。两国军事冲突的增加、作战双方对抗强度的增强、军备竞赛的加剧、一国军事力量的扩张等军事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突变的发生。而且质变发生的必然性寓于大量偶然性之中,通过对大量偶然性事件的了解和掌握就可以把握这种质变的突然性。因此,只要掌握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量变的情况,就能预见其出现质变的情况,而量变的情况是比较容易把握的。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事物内部固有矛盾也在不断地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种转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事物发生质的变化,即旧的性质消失,产生新的性质,并进而开始新一轮的量变,如此反复,使事物以螺旋式前进的形式发展。预测过程中要仔细区别各个现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具体分析事物发展过程中重复出现的现象,以把握事物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转化周期。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信息化武器的换代更新以及相应战争形态的演变就是经济、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和周期性发展的产物。预测中既要防止把事物的量变、渐进与趋势性绝对化,认为一切都是稳定的、不变的、必然的,又要防止过分强调事物的突变性和偶然因素的作用、否认事物的规律性及其变化的可知性。

三、预测方法

(一)定性预测方法

所谓定性预测方法,是指主要从事物的规定性方面,对未知



景。情景分析法能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把预测对象放在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环境、条件里,来分析并预测其各种可能的前景。比如说,预测军事战略问题,就必须找出并仔细分析影响、决定军事战略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地理及国际环境等因素,认真考察诸种因素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后综合、连贯起来加以研究,才可能对未来军事战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

5. 关联树法。其基本做法是从一个总目标分出达到目标的各类、各项子目标,理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按照一定准则判别各类、各项子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运用这种方法要绘出关联树图,并确定各自独立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可判断、预测每个项目对达成总目标的重要程度。

6. 条件类比法。即分析历史上出现某种与预测对象相同或相似现象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要寻找出现这种现象的前夕所存在的各种与现象出现有密切关系的条件和因素,然后与当前存在或未来近期内可能发生的类似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对近期内是否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作出判断。这种预测需要较充分的资料作依据,并要筛选恰当的比较对象,预测过程较为严谨,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二)定量预测方法

定量预测方法,是主要从事物量的规定性方面,对未知事物进行科学预测的一种方法。即把预测对象及外部因素的抽象属性都变为可进行数学计算的数字,运用数学手段建立一定的运算格式或数学模型,通过大量的运算得出预测结果。定量预测应用到军事领域,就是主要通过数量分析来预测未知的军事事物。在拥有充分的情报、信息、数据资料,而且可以将有关事件的各个因素加以量化的条件下,就尽量运用定量方法来进行军事预测。定量的军事预测方法比定性的军事预测方法要求更为严格,结论也更为精确。在具有连续性、稳定性、规范性的军事



具体地展示出来,而且通过控制变量和参数可以反复进行模拟试验,因此所得结论的准确度较高。不仅可以预测事物的量变、渐变,而且可以预测质变、突变,比趋势外推法进了一步。过程模拟法的弱点是建立数学模型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大都来自专家的经验或类似历史事件,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其次是运算量大,比较麻烦。

3. 概率统计法。即利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历史上出现过的与预测对象相同或相似的某种现象重复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其运动的周期性规律,从而预测这种现象下一次可能出现的时间,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可能出现的概率。这是一种比较简单易行的预测方法,不需要多少精确的原始资料即可进行预测,因而被经常使用。但预测结果的可靠性较差,不宜单独使用,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预测方法。

4. 目标回溯法。即先根据主客观需要提出预设的目标,然后从假定实现目标的时间往回推算,一直回溯到现在,再与现实状况进行对比,根据出现的差距进行相应的修正,直至完全满足现实和目标的双向要求,从而测算出实现目标所需的时间。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预测某种现实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能达到的水平,所以这种方法仍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①。

四、预测原则

(一)理据性原则

军事预测是一种主观认识活动,但它所考察的对象是客观的,考察的方法和尺度也是以往军率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军事预测绝不是凭主观上的想当然办事,而是要根据以往的军事实践经验、规律规则、理论方法和情报信息资料进行有理有

^① 见陈力恒主编:《军事预测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9 页。



未来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未来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否会走向“核后时代”,未来军队的组织形式,是否会向小型化、合成化方向发展,未来作战方法的变革,是否会趋于“超常规化”,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着眼于预测对象特定范围内的情况和特点,采用与之相适应的预测原理和方法去加以解决。预测军队的发展,由于推动军队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军事技术,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向主要是由战争需求所决定的,因此,“战争需求原理”也就成了预测军队发展的适用原理。在用数学模型进行预测时,关键在于所建立的模型是否能真正反映所预测对象的具体情况。预测课题是军事学术的还是军事技术的,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是中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基础理论方面的还是实际应用方面的,直接影响着军事预测原理和方法的选择。对战略性、长期性、理论性预测课题,应注重选用定性的预测方法;对战术性、短期性、实用性课题,应注重选用定量的军事预测方法。对战斗行动等时效要求紧急的对象进行预测应选用简便易行的方法,而对诸如研制新型武器这种时效性不强预测的问题则不同,它要求对杀伤威力、作用距离、命中精度、机动性能以及费效比等指标在逐个、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估计,因此所选的方法要着眼于精确而非简单迅速。

(三)辩证性原则

在军事领域,不论是战争、战役、战斗这类直接的暴力冲突,还是国防建设、军事结盟、军备竞赛、军事威慑这类潜在、间接、非暴力的冲突,都具有对抗的特点。军事预测也主要是对军事对抗的预测。由于军事对抗活动本身面有的复杂多变性,使得军事预测难度大、问题多。为此,进行军事预测时,必须坚持:

1. 必然与偶然相统一。要认识和掌握偶然性在军事领域起作用的规律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它往往使事物发展进程异常曲折复杂。如萨拉热窝事件既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导火索,又并非是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即使没有斐迪南遇刺事件,侵略者也会制造另外的事端。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两种趋向:一种是,事物在本质条件的影响下循着某种秩序稳定地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方面;另一种是,事物还受到某些非本质条件的影响而发生摇摆性变化,这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认识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偶然性中探寻其规律性及与必然性的联系,利用偶然预测必然。偶然因素对军事发展的影响,主要反映在量的变化上。在军事领域中的突变,是军事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反映,偶然因素就是这种突变的外部刺激因素。偶然因素对军事发展的作用又是必然性的具体反映。偶然性是表,必然性是里,二者的关系表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2. 精确与模糊相统一。误差、模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即使是精确的测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军事领域中不确定因素的大量存在使军事预见具有更大的模糊性。尤其是对中长期预测更是如此。这不仅是由于预测对象的复杂多变性,而且预测主体的知识、经验、情感、意志等主观方面的局限性也使军事预测难以做到精确完美。因此,不能苛求军事预测的绝对精确,过于精确的预测结论反而常常是不准确的结论。但是,这种带有一定模糊性的预测结论本身则必须是确定的,绝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而且千方百计使预测结论更为准确始终是预测研究努力的方向,这也就是各种各样定量预测方法出现的原因。总起来说,对预测对象要做到知其主流、大概而不求全求细,做到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的统一和结合。

3. 循规与创新相统一。军事预测主体既要遵循有关的经验、知识、理论和方法,在掌握有关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合理地推出预测结论,而又不能完全遵循现有的经验和理论进行循规蹈矩的预测,预测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



时间仍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军事预测特别是对于重大军事问题的预测,应该既进行定性预测,又进行定量预测,不仅用主要的方法预测,还要使用辅助方法预测,从而做到相互印证。

第六节 军事情报编写

军事情报编写就是把情报搜集、研究、判断的成果准确地表达出来。情报编写是情报搜集、识别、研究和判断等前期工作成果的具体体现,而情报编写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情报的作用和所能产生的效果。要做好情报编写工作,情报人员必须具有专门的编写知识和能力。

军事情报的编写与一般文章的编写有较大的区别,突出表现在其编写的严肃性上。军事情报是供高层首长和部门了解掌握情况和作出决策使用的,其重要性十分突出,因而编写人员责任重大,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进行这项工作。此外,军事情报编写有自己的一系列特点、规律和方法。

军事情报编写有以下要求:一是要做到迅速及时。情报编写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情报的时效,迅速及时地把获得的情报编写成文,就能及时地把情报传递给用户,从而发挥情报的效用。要做到这一点,情报编写人员就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要有丰富的知识和专业知识,及时了解掌握各种情况,及时跟踪和研究分析,对一些重要的和常用的资料、数据要熟练掌握。二是要主题明确。即编写的目的、意图要明确,通过本份情报的编写要为用户提供什么事实和观点要做到心中有数,要围绕主题这个中心进行编写,而不能漫无边际,不知所云。三是要取材得当。要围绕编写意图选材,不同的情报有不同的使用对象,因而有不同的要求,要从大量的情报材料中选取那些最能表达编写意图的、适合用户需求的材料;不仅要选择那些直



接的、正面的材料,而且对那些起烘托、反衬、强化、对比作用的材料也要适当选取。再就是要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把那些最能反映当前状况的新材料、新观点、新发现、新情况选取出来,这样才能及时反映现实。四是准确无误。军事情报是供高层领导和部门决策使用的,因此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和差错,在情报要素、文字表达等方面必须做到详细具体、清楚明确,要避免歧义和误解,切不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五是简明扼要。情报编写要文字精练,层次清晰,要做到言简意赅,开门见山,从而使用户能对情报内容一目了然。要在抓住要点的基础上用精炼的语言加以表述,切忌繁琐罗嗦。

依据一定的情报材料所进行的军事情报编写包括原文通报编写、改写通报编写和综合通报编写三种。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一、原文通报编写

(一)适用范围

1. 特别重要的情报。情况特别重要的情报不应改写,而应原文通报。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重要动向,对当时国际重大事件的重要反应,军政要员的重要言论,会谈纪要、秘密协定,重要的作战计划、命令、指示、报告,以及其他有文献价值的材料等,一般应原文通报。2. 需保留原始面貌的情报。如敌特对我进行破坏行动,引诱、策反我方人员,案件、事件线索,对方谈判底盘等。3. 简明扼要的情报。原文简明扼要、没有水份的,不必改写,而应原文通报。4. 内容不明的情报。内容隐晦或缺漏较多或因语气等其他关系不便改写的情报,均应原文通报,否则不利于阅者进一步研究和使用的。

(二)编写方法

原文通报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加以通报,而必须进行适当地加工。一是拟定标题。拟定标题是原文通报加工的一项重要内容。报文较长或涉及问题较多、眉目又不清楚的原文,为便于阅



前提。二是恰当选取材料。在理解、掌握原报内容的基础上,围绕通报意图和针对用户需要选取材料,也即选取有价值的材料,选取材料也是一个识别情报材料价值的过程。要注意不要遗漏有用的材料。重点是选取那些新颖、重要的材料。三是合理安排结构。情报结构应层次分明,条理清楚,重点突出,逻辑严密,首尾照应。四是保持材料原意。情报改写是以原文为依据进行的,是在保持原文意思的前提下所进行的语篇、语句形式和结构方面的加工,一定要保持原意,切忌添枝加叶,随意发挥。五是摆脱原文束缚。保持原意并非拘泥于原文,要摆脱原文束缚,灵活驾驭原文材料,即要“提起来写”,用编者的语气和简练通顺的文字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有时还要附加有关材料,以利使用。

三、综合通报编写

综合通报是在对情报素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确定的主题将若干份情报材料的内容加以归纳、概括、提升,用编者的语气进行编写的一种通报形式。综合通报是对情报材料进行分析性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有利于充分发挥情报素材的作用,能够挖掘和提高情报的价值。

综合通报的适用范围较广。对于不太重要、时效不急的情报如果单独通报则显得单薄、不够份量,因此应在积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写成综合通报;对那些重要的、紧急的情报在单份通报之后也可以继续积累和加工,整理成综合通报。既可以就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小型综合,也可以围绕某一专题进行大型综合。既可以定期进行综合,又可以围绕发生的事件进行综合。

综合通报的编写通常有以下步骤:

(一)确定主题

情报主题是一份情报所表达的中心意思。综合情报的主题是编者针对用户需要从大量材料中概括提炼出来的,是一系列



理要符合逻辑,不得相互重叠交叉或矛盾对立,各标题的表达形式要保持一致。

(三)选取材料

在主题确定之后,就要紧紧围绕主题选取材料,不要选取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如果发现了有悖主题的材料则应修改主题或查证材料。所选材料在兼顾全面的基础上要具有典型性,即尽量选取有代表性的、能说明主题、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典型材料。要做到既珍惜点滴、不遗漏有用的材料,又不琐碎散乱、眉毛胡子一把抓。在取材的详略上,选取重要的、较新的材料要详细具体,次要的、较旧的材料则可简略。

(四)安排结构

即怎样开头结尾、谋篇布局、确定层次、划分段落及安排先后顺序等。综合通报往往篇幅较大,结构较复杂,因此要注意在统揽全文的基础上安排局部,要更加注意层次的区分。综合通报的导语、正文、结语之间要互相照应,段落、层次以及文句之间的衔接、过渡要符合逻辑。



第五章 军事情报学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学科,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会通过实践总结出一套适用于自身发展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军事情报学这门新兴学科来说,自然也不例外。所谓科学研究方法,就是正确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科学研究方法是伴随科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从科学研究方法应用范围和功能大小的角度,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逻辑方法。这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它们既适用于自然科学,又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二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这是从各个学科研究方法的共性中抽出来而形成的普泛化方法,具有横断性与综合性特征,如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整序方法、分析综合法等。这些研究方法通常都受哲学方法的制约,并与数学方法相结合,既有定量,又有定性,因而对于各种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适用的。三是各个学科本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其特征有二:第一,专用于研究本学科对象,具有别的学科方法所无法替代的特点;第二,作为学科的标志,应对整个科学体系产生影响,即对别的学科具有“输出”性质,能为其他学科所采用或移植。

从另一角度来说,一门学科在具有以上三种方法的同时,其内部不同的层面还应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军事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理论、情报史和情报技术研究的方法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报活动,总是要首先研究军事情报活动某些现象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层次或各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分别做出本质的规定,然后再把这些研究的具体结论综合起来,从总体上形成对军事情报活动一些现象一般性的结论。这就需要运用逻辑方法中的分析与综合法。这两种方法是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1. 分析法

分析法是在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中将军事情报活动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方面、特性等,对它们分别加以研究,揭示其各方面本质的思维方法。

军事情报活动自身包含着许多部分、方面和因素,同时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活动和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的军事情报活动再对表现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直观地研究是无法掌握其本质的。运用分析法,就是深入到军事情报活动的内部,了解各个方面的内部联系,再对具体进行抽象,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偶然中发现必然,透过军事情报活动的现象发现其本质和规律。

2. 综合法

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综合法,是在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中将已有的关于军事情报活动的各个部分、层次、因素和特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对军事情报活动整体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运用综合方法的过程,就是由具体事物的研究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分析法是把军事情报活动分解为各个部分、层次和方面,并对其本质加以把握。但还不能从相互联系上研究军事情报活动,不能整体把握军事情报活动的发展变化,不能获得对军事情报活动整体的本质的认识。因此,还应该运用综合法,把那些在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军事情报活动的各个部分的、各个方



体。系统的特征主要有：“集合性”，意思是系统至少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以相互区别的要素组成；“相关性”，指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非加和性”，指整体的性质、功能和行动并非各组成要素的简单迭加；“环境适应性”，指系统存在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之中，并与外部环境产生某种相应的关系，适应环境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系统之中，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是我们在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的前提条件。

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的认识效果。系统方法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性。这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它把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世界上各种对象、事件、过程都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二是综合性。其含义有二：一方面它认为任何整体都是由部分为特定目的面组成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它要求对任何对象的研究，都必须从它的成分、结构功能、相互联系方式、历史发展等方面作综合的系统的考察。三是最佳化。根据需求和可能为系统定量地确定出最优目标，并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把整个系统分成不同等级、层次结构，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系统总体的最佳目标，以达到总体最佳化。军事情报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必须运用系统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察研究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战争、指挥、决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军事情报学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五）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1. 定量分析法

在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中，定量分析法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



3. 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

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的作用是不同的。定量分析法属于微观分析方法,它是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中一种具体的方法或手段。而定性分析法,一般是属于宏观分析法,它是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最后目的和最高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定量分析为定性分析提供必要的依据和材料,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质的飞跃,它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军事情报活动的本质或属性。因此,二者既不能相互分离,也不能相互取代,只能相互结合。在运用这两种方法时,既要避免过高地估计定量分析法,也要避免过高地估计定性分析法。

(六)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

当代科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与影响正在加强,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正使这种交叉、渗透与影响更加深入。对于军事情报学来说,一方面由于它还比较年轻,还没有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军事情报学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的特点,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自然要受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应注意和军事情报学结合起来,使这些方法与军事情报学已有的理论、方法水乳交融,为军事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做出贡献。否则的话,对军事情报学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是有害处的。

三、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程序

军事情报学科研活动的过程,是透过情报活动现象认识其本质、规律的过程,是产生新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过程。这个过程需经过前后紧密相联的若干步骤,表现出一定的程序



性。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程序大体包括这么几步:选定课题、获取事实、提出学说、检验结论。

(一)选定军事情报学研究课题

选定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课题主要是依据情报活动的需要与主、客观条件的可能条件,运用军事科学和情报学提供的各种理论、原则、方法,在充分掌握信息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提出、论证和确定军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课题。课题的论证要求客观、科学、充分。提出的课题的范围可大可小,内容可简可繁。当课题较复杂时,还要同时确定科研工作计划,写出开题报告或选题说明书。其目的在于明确科研工作的主攻方向、研究对象、具体任务和基本要求,找出完成任务的最佳实施方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二)获取军事情报活动事实

获取军事情报活动事实,主要是针对所选的课题,通过实践、调研等途径,以及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与数据,充分掌握情报工作中提供的现实情况。获取情报活动事实的途径与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根据课题需要与可能条件来加以选择。但必须做到,获取的事实材料,应该是对研究对象存在的各种现象、过程、事件的真实性描述。

(三)提出军事情报学理论学说

提出军事情报学理论学说主要是根据大量的资料,运用哲学方法、逻辑方法、系统方法等各种科学方法,经过鉴别、比较、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一系列思维加工活动,概括出反映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当要求提出系统的学说时,可以先分专题进行研究,待得出一系列以科学事实为依据和科学真理为指导的具体结论之后,再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逐步构建学科理论框架,使之形成尚待实践验证的理论体系。

(四)检验结论



对于所提出的军事情报学理论体系,主要是根据课题的性质、内容、要求和一切可能条件,运用一种或多种恰当的科学检验方式,对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践检验和逻辑论证,使之成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节 军事情报史研究方法

军事情报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人们在研究军事情报史的时候,往往也采用历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同时,军事情报史作为军事情报学的一个下级学科,其研究方法又深受军事情报学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情报活动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研究军事情报史的目的是为了理清人类从古自今从事军事情报活动的发展轨迹,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规律。

一、军事情报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军事情报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上的军事情报工作。包括军事情报活动史、军事情报思想史、军事情报技术史。通过对其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探讨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军事情报活动史

军事情报活动史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上军事情报活动的产生、发展变化情况,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对战争等军事活动的影响等。

(二)军事情报思想史

军事情报思想史是军事情报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军事情报思想史研究,主要是探讨历代军事情报思想的发展状况及其与军事情报活动的关系等。

(三)军事情报技术史



理论、方法的课题。因为军事情报史研究方面的经验不上升到理论,就会缺少必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会直接影响军事情报史学科的建立,妨碍军事情报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在确立军事情报史研究课题时,既要看到情报事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军事情报史研究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应正确处理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的关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2)可行性原则。如上所述,在确立军事情报史研究课题时,遵循需要性原则是必要的,但需要仅仅是一种愿望和期望,要把这种愿望和期望变成现实,还必须充分考虑完成课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是否具备。因此,还应遵循可行性原则。一般来讲,完成课题需要的基本条件包括:理论条件、物质条件和能力条件等。

(3)发挥优势原则。在确立军事情报史研究课题时,应从本单位和个人的长处出发,以保证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保质保量地尽快完成研究课题。

(4)发展性原则。在确立军事情报史研究课题时,应该考虑其课题成为学术成品后是否对情报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对军事情报史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完善与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等。

(5)创造性原则。确立军事情报史研究课题,还要遵循创造性原则,即快照新颖、独特、先进的要求予以确立。比如,别人从没有研究过的具有保索性的课题,从新角度、新层次、新水平去研究曾经研究过的课题等,均属于创造性课题。创造性课题所取得的成果,在理论性、基础性等课题研究中表现为新发现、新理论、新观点、新见解,在应用性课题研究中表现为新经验、新启示。创造性原则体现了军事情报史研究的价值原则,即保证未来的学术成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在确立军事情报史研究课题时,要把创造性原则作为重要的根据之一。



的分类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有很多时候还需要进行再分类,甚至三次、四次分类,从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

对军事情报史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在于把分散的、混乱的史料归入一定的类别之中,使其统一在各种类别之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突出这些史料的属性及其内在联系,从而也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2)时序整理法。时序整理法是按照军事情报史料反映军事情报历史事实的时间先后顺序整理史料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分门别类整理的基础上,继续整理军事情报史料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分门别类整理的史料,虽然已经变得较为一致,并且还显现了它们的特殊性,但它们之间的时间关系还没有理顺,显得较为凌乱。如果不加以整理,使用起来仍不方便,还可能会出现时间上的差错。因此,在对军事情报史料进行分门别类整理后,还应对每一小类中的史料再按反映历史事实的先后,予以进一步的整理。

(三)军事情报史料研究的方法

军事情报史研究是根据军事情报史料来分析军事情报历史事件,揭示军事情报工作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要从军事情报史料中显现出军事情报工作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并引出其发展的规律,就需要对报集、整理的军事情报史料进行研究。对军事情报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包括一般的哲学方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等。大多数方法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原则性的方法。

1. 从历史事实出发

军事情报历史事实是进行军事情报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军事情报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才有可能如实显现军事情报工作发展的真实的具体的过程,总结与揭示军事情报工作的经验与规律。



要做到从军事情报历史事实出发,首先要求必须占有大量的军事情报史料。历史中的现象与事实不能再现,因此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只能借助于大量的史料。军事情报史料的数量、质量情况,直接关系到对军事情报工作历史事实的认识水平。要保证史料的数量和质量,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广泛搜集,二是认真鉴别。这是把握军事情报工作历史事实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其次,我们还应该做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已有的军事情报史结论。进行军事情报史研究,应从军事情报工作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结论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对于已有的现成结论,应该慎重对待。当然,也要注意避免轻视正确结论的倾向,因为已有的正确的结论对于研究工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2. 具体地、历史地分析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后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要与它所在的历史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所以,必须把历史事实放进历史中予以考察、研究和认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历史事实的本质与规律。

把军事情报历史事件放进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军事情报史研究中,应避免出现这样一些现象:用研究者现在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观点,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其结果要么是苛求前人,要么就是把他们现代化;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概念或论证历史结论的需要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或事实。关于这一点,在《孙子稗疏》中有一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对待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既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横挑鼻子竖挑眼,从而厚诬古人;也不能视古人如神物,仿佛今天的什么问题他那里都有现成的答案,我们这些不肖



子孙只消去发掘一番就是了。归根结底,还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即是,非即非,我们没有义务为昔贤吹嘘什么,也没有权利遮掩什么。关键在于明确:古人究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在他当时是进步还是落后,是推动了历史前进、还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如果要指责他没能为我们提供什么,那首先必须证明,他的时代是否要求他、容许他提供这些。这应该是评价古人历史功过的惟一标准。”^①

^① 华星白:《孙子稗疏》,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



第六章 信息战争与军事情报

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而其发展方向则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的主流、核心技术,并推动社会向信息化方向发展,军事信息化、产业信息化、经济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生活信息化、信息网络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使得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大踏步地朝着信息社会迈进。与此同时,经历了冷兵器时代、火器时代的战争,目前正在进入信息战争时代,战争形态的信息化演变成为新军事革命的主要内容。信息时代的战争是高技术战争,而其高技术则集中地体现为侦察探测、精确制导、电子战、隐身和 C³I 系统五大技术,这五大技术的核心则是以微电子、光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信息战争时代军事情报的内容、地位和作用有质的改变,突出表现在情报、信息本身已成为直接的作战要素,信息战成为信息时代战争的主要样式。这既为军事情报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军事情报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节 军事信息化

军事信息化就是在军事领域广泛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装备,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信息资源,从而极大地提高军事实力的过程。它包括发展和采用军事信息技术和装备,建立国防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信息武器装备,创立与信息



器装备的产生,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武器装备体系中信息技术的含量和整体作战效能,使战争机器的运转越来越依赖于信息。

二、军事信息系统成为军事活动的基础

军事信息系统是保证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对部队人员和武器系统实施指挥与控制的人—机系统,它主要由情报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通信系统组成。情报系统采用各种侦察手段获取有关敌情和目标信息;指挥控制系统利用计算机进行情报信息处理,作出分析判断,得出数据结果,以便指挥员定下决心,下达命令;通信系统完成情报信息和指挥控制信息的传送。军事信息系统分为战略的和战术的两种。战略军事信息系统担负着国家最高指挥当局对军队和战略武器进行指挥控制的任務。战术军事信息系统能利用多种信息获取手段和信息处理技术,完成对一定范围内敌情的监视,主要是保证在战役战术作战行动的全过程中,能不间断地指挥和控制参战的军事力量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达成战役战术目的。军事信息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保证所需大量情报信息的探测、收集、处理、传输和武器的控制,实现作战资源的最佳配置,提高指挥效能,实现跨层次直接指挥,提高武器作战能力,实现一体化精确作战。因此,军事信息系统成为军事活动的基础。

三、信息武器系统成为军队的核心武器装备

信息时代生产工具的典型特征是信息和智能,信息时代的战争工具必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核心技术是军事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的武器装备是全新概念的武器装备,即信息武器装备,其典型特征是信息与智能。因此,信息时代的战争工具从本质上说是信息和智能战争工具。以信息为基础、以智能为特征的信息武器装备系统分为软杀伤型和硬杀伤型。软杀伤型信息武器又可分为以计算机病毒为代表的各种计算机网络攻击型和以电子战武器为代表的电子攻击型。



的概念,将信息战定义为:通过影响敌方信息和信息系统,利用和保护己方的信息和信息系统来取得信息优势。

俄罗斯军方认为,信息战是在军事行动的准备和进程中,为夺取和保持对敌信息优势,按照统一意图和计划所实施的信息保障、信息对抗和信息防护的综合措施。其内容是:信息保障,主要包括侦察、司令部信息工作、信息收集和通信;信息对抗,主要包括伪装、反侦察、火力摧毁和电子压制敌信息系统;信息保护,主要包括信息检查、信息保密、信息系统的抗火力毁伤和电子防护。

我国学者朱幼文认为:“信息战是对立双方为争夺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而展开的斗争。”^①我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信息战作为一种战争形式,通常较充分反映在情报战和电子战方面,信息战不仅是一种战争形式,而且还主要是一种战争形态,信息战是在战争中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信息武器的基础上,构成信息网络化的战场,进行全时空的信息较量的一种战争形态,核心是争夺战场信息的控制权,并以此影响和决定战争的胜负。

我们认为,通常意义上的信息战是以信息及信息系统为攻防对象,以信息武器装备为战争工具的战争。信息战主要不是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和摧毁敌方军事设施,而是破坏敌方有生力量和军事设施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包括敌方信息探测、信息传递、信息处理和信息控制在内的军事信息系统。信息战是社会信息化、军事信息化的必然结果,是继冷兵器战争、火器战争之后的新的战争形态。信息战主要以信息和信息系统为攻防对象,以获取信息优势为目的,其领域不限于军事,还包括政治、外

^① 朱幼文著:《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开性和可互相渗透的特性,否则信息就不可能迅速流动并为人所用。全球信息环境的公开性和可渗透性,信息时代社会对信息系统的高度依赖性和信息系统的脆弱性(易损、易毁、易被利用),信息技术和产品的扩散性及军民通用性,人和社会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等因素,使得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的损失急剧增大。

第二层次:知识战。知识战对应于认知的知识层,以知识化信息系统为基础,将知识和知识化信息系统作为主要攻防对象,以获取知识优势为目的。知识战是信息战的核心,也是信息战的实质所在。这是因为,首先,在高技术条件下,对作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有价值的信息,即知识。在信息化战场之上,信息流量庞大,而且受污染的信息成倍增加,对指挥员而言,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从纷繁杂乱的“信息洪流”中判断、界定信息的种类、性质和利用价值,决定取舍运用。总的来说,信息在经过加工处理变成人的认识之后,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当这种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时,即形成为知识。相对于信息而言,知识才是对于战争胜负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在军事对抗中,对抗双方在信息空间所必须充分利用和反复争夺的就是那部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知识”,只有将信息资源变为知识资源,夺取信息化战场的主动权才能成为现实。其次,对大量信息进行分析、判断、定性、区分靠的是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在占有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需要依据知识库中有关敌我双方及环境的知识完成目标搜索、识别、跟踪,提供敌方行动的各种可能,并拟定出己方对付敌方行动的各种方案。没有知识,就无法剖析所获信息的本质属性,实现从信息采集到信息使用的及时化、准确化,并纠正在运用中出现的偏差。再次,信息化武器装备,如 C⁴ISR 系统、精确制导武器、电子战装备和各种高技术作战平台等,它们都是知识高度密集型的战争工具,因而具备传统战争工具无法比拟的性能、功能和作战能力与效果。所以说,信息战的实质



则、作战原则和信息战原则的过程。“智能武器”的出现与广泛应用,是高技术战争的主要特征,也是信息战的重要标志。智能武器具有目标识别、自动寻的、末端制导、隐身伪装和抗干扰等能力,表现出极高的突防能力和极高的杀伤能力,从而实现精确打击,并导致作战的精确化。美军新的作战理论就要求充分利用各种精确作战能力,对目标实施精确的侦察与定位,对力量实施精确的投放,对作战过程实施精确的控制,对打击效果实施精确的判定。而智能化是精确化赖以实现的关键,在精确化制导武器中,无论采用哪一种制导方式,都离不开具有高速信号处理和反馈能力的智能化装置,也可以说,精确化是智能化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高智能性的 C⁴ISR 信息系统把诸多的技术兵器作战单元与战场合为一体,智能武器才产生了巨大的作战能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信息战的核心是智能的较量。

三、信息战的类型

从内容范围上分,有广义信息战和狭义信息战。广义信息战是敌对双方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为争夺信息优势而进行的斗争。狭义信息战则是军事领域的信息战,包括侦察反侦察、干扰反干扰、欺骗反欺骗、隐身反隐身、摧毁反摧毁等信息战形式,其核心是指挥控制战。从层次上分,有信息时代的战争、信息化战争、信息战,或战略信息战、战役信息战和战术信息战。从作战类型上分,有进攻性信息战、防御性信息战。进攻性信息战是指通过拒止、破坏、扰乱、摧毁、欺骗敌方信息和信息系统从而控制信息环境的信息作战行动。通常包括心理战、电子战、军事欺骗、物理攻击和信息攻击等。防御性信息战是保护己方信息和信息系统免受敌方攻击、破坏的作战行动。通常包括作战保密、信息保护、欺骗对抗、情报对抗和心理对抗等,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支援攻击性作战行动。从杀伤机理上分,有软杀伤信息战和硬杀伤信息战。心理



战、“黑客”战、“病毒”战、虚拟现实战等属前者,用物理摧毁手段实施的信息战则属于后者。从信息战的表现形式看,主要有情报战、心理战、网络战、精确战、智能战等。

第三节 信息战争时代军事情报的特点

信息战的核心问题是信息问题。信息战之所以成为信息战,是由情报信息在信息战中的重要性决定的。众所周知,情报信息在传统战争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孙子早在 2000 多年前就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么,与传统战争中的情报信息相比,信息战时代的情报信息有哪些特点呢?

一、地位突出

情报在传统军事活动中只是处于从属和保障的地位,打什么目标就提供什么情报,而且其活动范围及其手段方法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军事信息化,传统的情报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军事斗争的要求,传统的情报活动的狭隘性、滞后性等问题已非常突出。现代战争已进入信息战争时代。信息战时代不论是利用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实施的硬打击,还是利用信息和电子对抗手段实施的软杀伤,都完全是在情报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抗的目标也主要是对方的军事信息系统。信息战是军事信息系统之间的对抗,情报信息是信息战的基本要素,作为战争保障的信息情报活动和制信息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战争本身。

信息战时代为情报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军队的结构和武器装备空前复杂,打击能力、机动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空前增强,战场信息量空前增多。信息战时代对信息的运用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由单一的信息报集活动发展为运用信息手段进



行对抗的军事行动,成为新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式。力量型战争与信息战争对信息的依赖程度不同,力量型战争主要是利用兵力兵器的数量优势,而信息战争则主要是利用情报信息的准确和技术优势。军事信息系统成为信息战的关键要素。未来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必须使用先进复杂的信息系统,因为只有依赖智能化军事信息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各种信息武器系统的优异性能。而且现代信息技术为作战进攻提供了“发现即摧毁”的条件。过去由于受到武器性能的限制,对敌方纵深的目标即使发现了也无法摧毁。信息战时代只要能十分精确地确定敌方目标的时空位置数据,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就能对其迅速攻击和摧毁。可以说,与传统战争相比,信息战争中的情报信息已不再从属于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而是反过来,各种军事行动及信息武器的使用,开始从属于情报,即有什么目标的情报,就打击什么目标。这种从属关系的变化,说明信息情报对夺取战争主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对抗结果将直接取决于情报信息活动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情报信息在信息战中所处的地位是空前突出的。

二、作用增大

一是信息对部队战斗力具有倍增作用。情报信息系统通过实时或近实时的信息搜集、处理和传递手段来提供准确的情报信息,可大大提高部队的战场感知能力、反应能力和协同能力,从而可使指挥员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及时抓住战机,使己方部队能以精确的纵深火力进行战场造势,分割敌方,剥夺敌方行动自由,并在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集中适当的兵力,从而准确、高效地使用兵力。武器装备特别是信息武器装备在信息和信息系统支援下作战效能明显提高,而且信息技术正在使这些信息武器装备向精确化、智能化、远程化、隐身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使其突防力、杀伤力、生存力和命中精度得到极大提高。过去由于情报信息的时效性较差,而且部队机动能力也较差,这两种状况



导致了无法充分发挥甚至无法发挥情报信息的作用。现代军事信息系统的运用和部队机动能力的增强为情报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条件。二是可提高指挥效率。传统作战指挥方式是垂直的、层层的管理控制方式,这种方式效率低下,时间滞后。现代军事信息系统增强了战场上的信息互通能力,这种互通能力不但存在于纵向层次的指挥结构当中,而且存在于横向的作战系统之间,从而使指挥员能够加速决策和下达指示的过程,并能随时对敌人的行动作出迅速的反应,部队各级作战系统之间作战行动的协同水平以及部队的机动能力和灵活反应能力得到提高。三是可提高部队战场生存能力。情报信息系统能及时查明敌方威胁情况,从而事前做好防护,防止被探测和命中。敌我识别系统配合其他传感器及通信技术,使战场上敌、我、友的位置及状态能清楚显示,既防止了误伤,又为部队提供了采取各种行动的时机。而战斗力的倍增更是部队生存能力提高的主要原因。四是信息可对兵力兵器起补充作用。信息和战斗力具有互换性。过去由大量部队实施警戒的非决定性作战区域,可由信息侦察监视系统来警戒,从而为集中作战力量于决定性地点创造了条件。此外,利用信息及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信息欺骗、信息篡改、心理攻势及信息阻断等,都能起到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制胜的作用。

三、范围广泛

一是内容范围广泛。信息时代的战争较之传统战争有着更广泛的领域,信息战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均已超出纯军事的范围,各种各样的信息战行动常常以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安全等领域里的目标为作战对象。军事情报,无论是战略层次的还是战术层次的与上述领域的情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军事情报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二是空间范围广泛。信息时代世界高度融合,经济高度一体化,世界各国和地区在政治、经济



广、行动自由,而其抗电磁干扰、抗反辐射导弹、抗隐身飞机、抗巡航导弹雷达具有先进的跳频控制功能,并充分开发了频率、幅度、相位等时间资源和变极等空间资源。高精度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GPS)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信息技术领域引人注目的新成就,目前其功能已从导航定位扩展到目标瞄准、精确制导武器投放、指挥控制、通信以及精密授时等。

第四节 信息时代的军事情报及其研究活动

一、信息时代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要适应信息战争的特点和需要

信息时代的战争是高技术战争,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高技术群体中的核心技术,信息系统及信息武器装备成为关键性的斗争手段,因此,高技术战争也可以称为信息化战争。信息战主要是制信息权的较量,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战斗力不再是战斗机、坦克、战舰等,而是无形的信息要素。现代高技术战争的实践表明,信息优势是制胜的关键因素,是确立军事优势与战场优势的先决条件;包括全球性、全国性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系统在内的战场一体化信息系统与先进的信息武器装备,是对战争胜负起重大作用的客观物质条件;信息与物质、能源力量成为战争的三大资源,而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更为关键的要素;信息战不仅体现了高技术战争的主要特征与基本内涵,同时也显示了当今信息社会军队建设由技能型向智能型转变的新趋势。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的发展,促使军事呈现出两项重要的变革:一是推动了一场新的武器系统的革命,导致出现了信息化、智能化的武器装备,如精确制导武器、遥感武器、隐身飞机、隐身军舰等,出现了武器系统的高效化、精确化、自动化和智



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也必须变化,其研究领域必须拓宽,研究深度必须增加,只有这样,其研究成果才能适应信息战争的需要。信息时代军事情报学研究应在充分认识信息及信息活动在现代战争中的特点和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更新观念,打破框框,积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历次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深入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既提供应对信息战的策略和方法,又提出新的军事情报理论和方法。

二、信息时代的军事情报实践活动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信息时代的军事情报信息活动必须做到:

(一)侦察探测周密化

信息时代,情报信息来自于战场的全方位、全时空和全频谱,而战争的精确性打击方式又要求情报信息是准确、细密的,这就要求侦察探测必须做到周全、精密。要连续、严密、多频谱地监视和观察敌人,掌握战场方方面面的情况,使战场对己方透明。一是要利用各种器材、各种手段,透过云层、夜暗和可穿透的地表对战场进行细致地观察,随时掌握战场的种种情况;二是确保完整地收发传感数据,注意避开脆弱的通信节点,确保数据、信息直接分发给射击诸元;三是确保全而、准确地进行战斗毁伤评估。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对南联盟的许多目标没有发现和捕捉到,对打击目标的毁伤情况未能进行有效地评估,许多被摧毁的目标是假目标,促使美军提出了一系列改进侦察探测、定位跟踪和毁伤评估精度与确度的措施,以增强反伪装、反隐蔽和反欺骗能力,如建立专供军队使用的、精度更高的第二代全球定位系统,并提供全部加密抗干扰信号,采用现代化天线和增大卫星输出功率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改进多光谱侦测,将光电侦察系统从原来的单频带成像改为在7个频带上搜集和评估信息。

(二)传递报送实时化

传统战争中由于条件所限,情报的获取、研判、传递和使用



精确程度、杀伤能力和生存能力成几何级数增长,但数字化部队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1. 数字化技能的掌握难度较大。数字化装备的硬件和软件都更新很快,部队人员的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数字化作战技能的熟练掌握不易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容易丧失。2. 信息分析识别难度大。传感器大量投入战场,收集的信息数量十分庞大,其中有真情报,也有假情报,虽然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能够处理大量信息,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对情报的分析和判断还是主要靠人,数字化部队还不能完全处理、分析和吸收搜集到的全部信息。因此,大量增加的信息可能使指挥官应接不暇,也可能使处理信息的士兵感到一筹莫展。3. 探测器并非全知全能。探测器不可能将战场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数字化部队面前,它在探测距离、分辨率、全天候探测能力和装备数量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战争中仍然存在着欺骗、伪装、隐蔽和不确定性,探测器只能使未来战场的透明度不断增加,而不能使其完全透明。4. 军事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导致其易损易毁。信息战中军事信息系统的生存能力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全球信息环境的可渗透性和开放性将使C³I系统基础设施极易受到攻击或被利用。为保障军事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必须分析己方易受敌方攻击的弱点,尔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需要从各个方面对军事信息系统严加防护,如制定旨在查明对C³I系统构成威胁的安全防护计划,分析本部队的信息结构,以确定需要重点防护的信息路径、信息系统和数据。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有:使用多节点、多路径、多频率的系统,并对其实施分散配置;使用流动型卫星接收装置,并经常变换配置位置;在固定发射阵地间埋设光缆;从次要节点发射欺骗信号;制定备用通信计划,保留冗余通信线路;不断更新信息技术装备,保持C³I技术优势等,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行之有效的措施。



- 36、吴明冰:《特种战线》,金城出版社,1996年。
- 37、《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
- 38、《军事辞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 39、总参谋部军训部:《科索沃战争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 40、肖占中:《军事思想与军事战略》,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
- 41、吴如嵩:《制胜智慧》,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
- 42、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高技术知识教材》,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 43、潘湘庭、弓志毅:《高技术与世界格局》,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
- 44、王保存:《世界新军事革命》,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 45、李显尧等:《信息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 46、陈力恒等:《军事预测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 47、卜延军:《军事预见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
- 48、颜春连:《无线谍报》,金城出版社,1995年。
- 49、晋国仁:《20世纪军事情报战秘密档案》,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
- 50、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 51、周碧松等:《21世纪信息战》,未来出版社,1999年。
- 52、国家保密局:《信息战与信息安全战略》,金城出版社,1996年。
- 53、周毅等:《信息学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 54、汪致远等:《决胜信息时代》,新华出版社,2000年。
- 55、邹志仁:《信息学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56、朱幼文等:《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

